

雪山的回望： 青銅時代成都平原的「先人」之地

林圭偵*

西元前一千紀之交，具有十二橋文化內涵的各聚落，在現今成都市區形成以十二橋及金沙為首的聚落叢集，成為新的聚落中心，成都平原上其他各地亦紛紛出現許多小型村落。此時不僅聚落增加、分布更廣，人口組成也更趨多樣化。發達的祭祀活動凝聚了多元社群，祭祀器物則見證了與周邊地區的交流。

與此同時，在岷江上游早於成都平原興起的各聚落，因位處川西山區的交通要道，仍維持一定的區域交流，與平原形成複雜微妙的關係。本文藉由重新檢視岷江上游營盤山遺址二〇〇三年出土的二具「人祭坑」，與一九九二年發現的牟托墓地——二處恰好位於社會地位光譜二端的墓葬，試圖呈現「邊緣地區」的複雜主體，以及原本難以捕捉的區域界線。由此，山區與平原自新石器以降形成的區域關係，在器物傳播之外浮現更加複雜且變動的圖像，不僅物質文化的流動更富層次，也涉及精神與生業各層面，影響其後的區域發展。我們似乎不能以簡單的（次）中心與邊緣關係理解二地的交流，川西山區亦非孤懸於交流體系之外，而是選擇性接收了外來文化，並將其融入當地的使用脈絡。「雪山」不僅是透過詩人之眼觀看到的雲霧仙鄉、文化源泉，其內在也有真實的血肉與主體性，其本身也回望著成都平原。

關鍵詞：成都平原 岷江上游 十二橋文化 器物坑 人祭坑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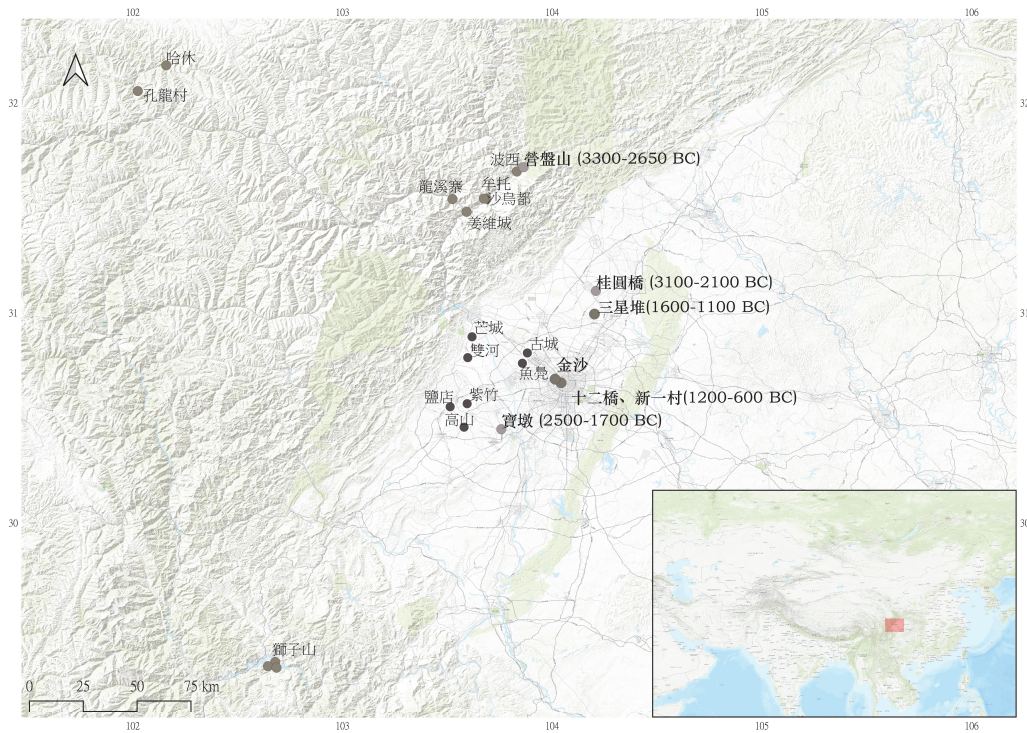
本文的田野經費，感謝科技部計畫（MOST106-2410-H-001-083-MY3、MOST109-2410-H-001-009-MY2）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補助。

林圭偵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里船

——杜甫 (712-770)，〈絕句〉



圖一：文中所提川西地區主要考古遺址

一・新石器至青銅時代川西的區域文化

(一) 雪山：新石器時代之青藏高原東緣

以今日的四川省行政區來看，除了四川盆地和週緣的丘陵，廣大的西部和西南部與青藏高原、雲貴高原連為一體，常被稱為「青藏高原東緣」，動輒是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是多條大川的發源地，並由此下切出許多大致成南北向的河谷，形成大小不一的河階地和山間盆地，這也是聚落賴以發展的主要腹地。費孝通指出少數族群（主要是藏、羌、彝族）在甘肅南部、四川西部、西藏東部及雲南西部間，循地勢及資源移動，將這些區域串連成連動的整體，便是習稱的橫斷

山脈，他並意識到此一族群頻繁接觸和流動的地帶，或許都可溯及更早的歷史。事實上，透過大小支流由北至南串連起的聚落，至晚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成為人員和物種匯流的通道，也形成考古所見多元併陳的物質文化，可說是西南絲綢之路及近代族群流動路線「藏彝走廊」的先聲（費孝通 1980, 1982；李紹明 1995）。

以近代以來的民族處境視之，我們很容易將橫斷山脈視為遠離（城市）文明的地區；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來到此地的外國傳教士、探險家、科學家和博物學家等，將其視為需要被教化的新奇他者、未開發之地。然而在考古上，早於成都平原成為人們所好的定居地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群活動，例如距今三至四萬年前，西藏羌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尼阿底遺址 (Nwya Devu) (Zhang et al. 2018)，為全球目前所知海拔最高 (4,600m) 的舊石器時代遺址。¹ 當西方探險家於二十世紀初期進入川西山區時，他們也發現在當時尚一知半解的彩陶、石棺葬、人骨和金屬器等遺留。根據這些非系統性調查而發現的採集點，人類學和考古學者隨後開始採取較為科學的調查採集和發掘，包含一九三八年馮漢驥在岷江上游進行民族調查，為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調查石棺葬之始；一九四〇年代吳金鼎等人組成的川康古蹟考察團（國立中央博物院編 1942, 64），以及凌純聲所率領的川康民族調查團（見凌曼立 1963）也先後到達此地探勘。至一九五一年馮漢驥提出了「石棺葬文化」的名稱（見馮漢驥、童恩正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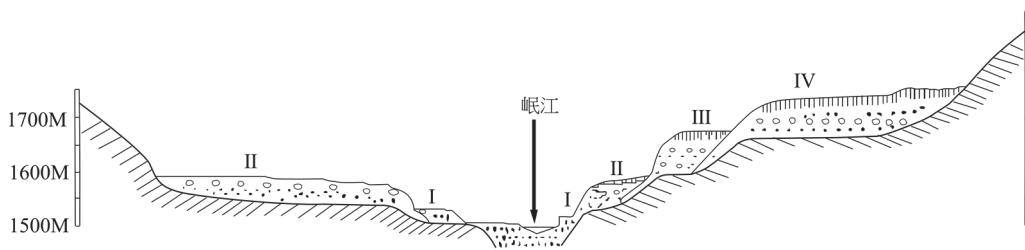
在與馮漢驥一同整理舊時採集遺物時，童恩正初期認為石棺葬的分布侷限於岷江上游，尤其其支流雜谷腦河一帶（馮漢驥、童恩正 1973），並與西北—西南間的民族遷徙有關，其中又以古羌族為主要構成民族。但隨之他便注意到這些利於移動的路線在文化、人群和物質文化傳播上的重要性，並藉由若干媒介如新石器時代的細石器、穿孔石刀，以及青銅時代的雙耳罐、曲莖劍，和貫穿新石器—青銅時代的石棺葬，依其分布時序與流變勾勒出由東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童恩正 1987）。

此一傳播帶在川西一部，有岷江、大渡河和各支流下切所形成的河階地（圖二），發展成為如營盤山等大小不一的聚落群。原居黃河中上游地區的人群，循南北向的河谷及毗連的松潘高原而下，為此地帶來了數波甘青地區及北方草原的文化浪潮。至新石器時代晚期，位於川西山區的諸河谷，已籠罩在甘青地區彩陶

¹ 此時的遺址雖然具有種種生活遺跡，然而對於人群的來源、移入路線和時間點都仍有很大的爭議，相關回顧與綜述可參考 Jade d'Alpoim Guedes and Mark Aldenderfer (2020)。

林圭偵

文化的氛圍中（如陳衛東、王天佑 2004；何錕宇 2011, 2015a）；其影響力更到達大渡河下游甚至更南方的山區。在這些地方，陶器的器形、裝飾技法、主題、設色，皆可見到外來文化的影響（陳劍 2006）。² 對於營盤山彩陶陶土的成分分析，亦顯示這類產品很可能直接來自於甘肅中西部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洪玲玉等 2011；崔劍鋒等 20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家窯文化的核心地區，彩陶往往作為陪葬品使用，並且佔整體陶器 20% 以上，遠高於在川西山區所佔之比例。後者彩陶則多出於文化層，即使以彩陶發現最多的營盤山遺址而言，也僅佔該遺址陶片 2-3%（陳劍 2007a）；或許由於得之不易，更有破損後加以修補的痕跡（Hung 2011, 48）。二地彩陶不同的使用方式、價值和埋藏背景，似乎暗示了彩陶傳播至川西山區時已有了不同的意義。



圖二：岷江上游階地，發育較好的黃土階地也是考古遺址較常現蹤之處
（改自楊農等 2003, 366, 圖 5）

彩陶文化的傳入同時伴隨了北方的生業型態，例如粟、黍的栽植（霍巍 2009；趙志軍、陳劍 2011；d'Alpoim Guedes 2011；于孟洲、夏微 2015）、採集穀物的石器，³ 和豬隻的馴養方式等（Barton et al. 2009；何錕宇等 2009；亦見 Lee et al. 2020b），成為一個技術叢集。或許是因為與甘肅南部具有相仿的環境⁴

² 其特色是以細泥紅陶或黃褐陶為底，上飾以黑彩繪製的紋飾；除了以粗細不等的條紋週飾口沿、器身，紋飾也包含草葉紋、齒葉紋、水波紋、圓點、網格紋、弧線三角紋等（陳劍 2006）。

³ 部分石器類型如半月形或長方形穿孔石刀，能在馬家窯文化及川西山區中的許多遺址找到對應的器物，或許與生業型態的傳播相關（參考安志敏 1955；陳星燦 2010；羅二虎 2000；羅二虎、李飛 2012）。

⁴ 儘管形成原因不一，但二者同為黃土發育良好的地區（四川大學 1965；徐學書 1995；張強祿 1996）。

與河道通達，⁵ 使川西北成為隴南地區居民從事交易或移民的首選，帶來北方的物質文化與生業技術。然而，我們尚無法確認移動的形式或機制為何？是人員、技術或產品的移動？遷移是否由於北方文化⁶ 擴張的結果或環境氣候上的惡化？⁷ 無論原因為何，因人口增加，為爭奪資源而發生的衝突或被迫移動，可能時常發生；其結果是將青海東部、甘南、川西、藏東、滇西北甚至黔中南，包含岷江、大渡河、青衣江、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流域所及，大半捲入互相牽連的傳播帶。在交通傳播帶上的人群，其接觸與流動應是頻繁的。只是由物質遺留所界定的考古文化，未必與人群的生物距離或族群標籤相符。

座落於岷江上游茂縣盆地的營盤山遺址 (3300-2650 cal BC)，為目前已知該地區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圖三)，在歷次近 15 萬平方公尺的發掘中，共發現有多座房屋基址，其中小型房屋常伴隨著柱洞、基槽、灶坑和貯火罐，中型房屋則有隔間；在遺址近中心偏西發現有疑為廣場的大範圍硬土面，局部仍可見到墊土和夯築的痕跡，硬土面下埋有四具人骨，或許具有奠基或作為犧牲的用意 (成都等 2018, 128-130)。⁸ 硬土面之外亦有葬姿扭曲的「人祭坑」及其他墓葬；遺址廣場北部發現有四座窯址及疑為石器加工的場所；另有灰坑、儲藏坑及器物坑等 120 餘處，以及多處灰溝 (成都等 2018, 18)。總和近十座「人祭坑」，僅二具 (2003M32、2003M40，下簡稱 M32、M40) 保存狀況尚可，筆者取其作為分析，將在以下述明分析結果。

⁵ 甘肅南部的白龍江，與四川嘉陵江和岷江上游支流均很接近。強調這項因素的有陳衛東、王天佑 (2004)、張強祿 (1996) 等，亦見陳肇 (2012, 115)。

⁶ 如仰韶文化或馬家窯文化。

⁷ 如陳衛東、王天佑 (2004) 認為，北方人群的南下是由於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北方大規模的降溫事件所致，移民在尋找更適宜生存的環境時，也將生業型態帶至新地。另一方面，李水城 (2011)、Li Liu and Xingcan Chen (2012, 232) 則傾向於將北方人群南下，視為黃河中游文化擴張後的結果。他們觀察到自仰韶文化廟底溝期以來，即有明顯的人口成長與擴張跡象 (Liu and Chen 2012, 191)，由陝西向西推進可能形成連動影響，使位於邊緣的族群也受到擠壓。這種擴張可能於西元前四世紀便已形成。馬家窯文化亦是這波擴張的結果，最終形成獨特的地區性文化，並持續向南、向西擴張。從環境證據來看，董廣輝 (2013) 提出甘青地區的二波擴張期——仰韶晚期至馬家窯文化早中期 (5500-5000 aBP)、馬家窯文化晚期至齊家文化早期 (4200-3800 aBP)，恰都是氣候較為濕潤的時期，可能導致農業產量的提高與人口增加；二個時期之間則是乾旱退縮的狀態。由川西山區所受到的北方影響來看，似乎也在此二個擴張期較為明顯。

⁸ 此種將「犧牲」埋藏於重要建築物之下情形，在史前各地區文化中常有發現，如成都平原高山遺址的城牆之下亦有類似的「奠基坑」 (周志清等 2015；劉祥宇等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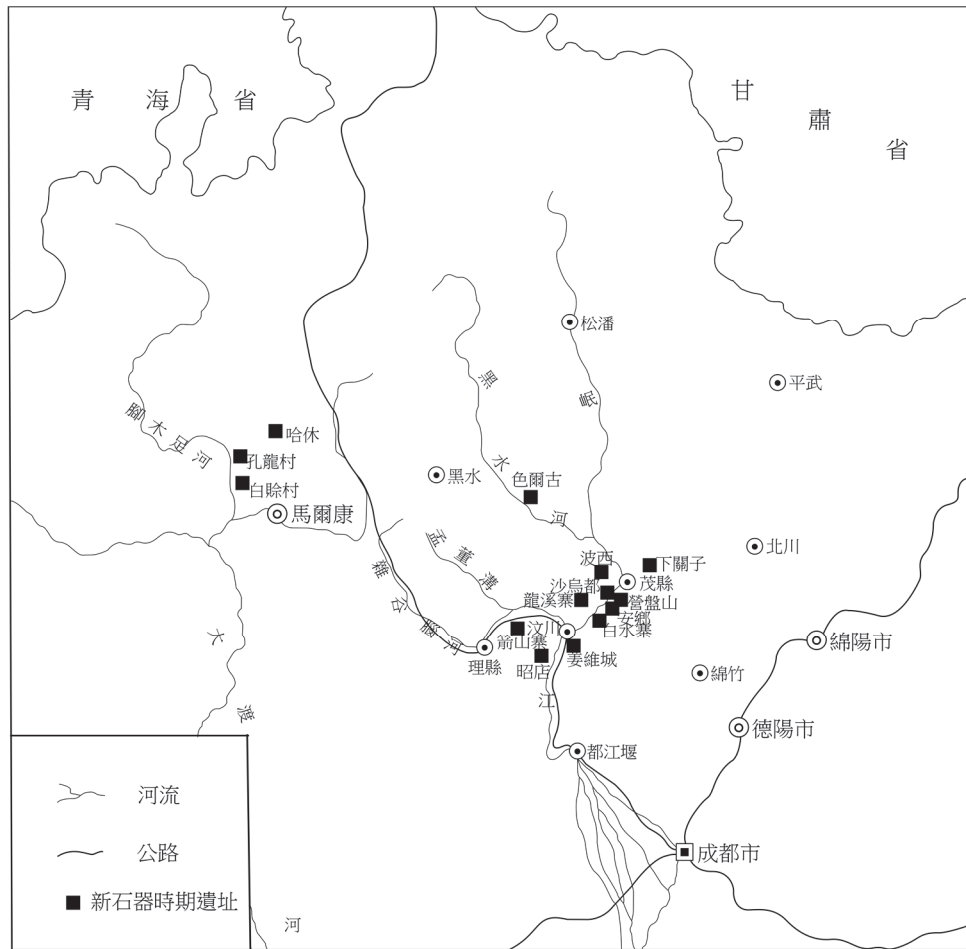
圖三：營盤山遺址所在河階地（作者攝）

各類遺跡中出土大量陶器、石器，以及種類和數量均繁多的動植物遺留。其多樣的陶器群中既有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ca. 4000-3500 BC) 的特色，⁹ 也有富於馬家窯文化 (ca. 3500-2500 BC) 風格者 (陳劍 2007a, 2007b)。陶器之外，玉石器 (含細石器)、骨器、蚌器等也達上萬件 (成都等 2002；陳劍等 2004, 2005；陳衛東、王天佑 2004；陳劍 2007a)。動植物遺留中則有大量粟、黍等穀物、果核和陸水生動物資源，能使人窺見其多樣的生業活動，並未完全如後世《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稱「土地剛鹵」只宜畜牧 (86:2857-2858)。相反，該遺址呈現出完整的生活遺跡與公共生產活動，可說是一處功能完備的大型聚落遺址。

這些營盤山的遺留與其他許多岷江、大渡河上游的遺址，如鄰近的姜維城遺址 (ca. 3000 BC) (四川大學 1965；徐學書 1995；黃家祥 2004；四川等 2006；何錕宇、鄭漫麗 2014)、雜谷腦河上的箭山寨遺址 (ca. 3000 BC) (短綆 1959；四川大學 1965；徐學書 1995；成都等 2007c)，和大渡河上游的哈休遺址 (ca. 3500-

⁹ 仰韶文化與馬家窯文化流行的時代、地區部分重疊，二者均以彩陶為主要特徵；學者或認為馬家窯文化為仰韶文化向西擴張後所衍生 (見註 7)，但歷來對二種文化的關係尚無一致的看法 (見張強祿 2002；丁見祥 2010；何錕宇、鄭漫麗 2014)，川西山區是否同時受到二者影響，或僅受到馬家窯吸收仰韶文化轉化後的影響仍難以分辨。

2700 BC) (阿壩等 2008, 2010; 成都、阿壩 2016) 等 (圖四),¹⁰ 共同構成既有當地特色又明顯受北方彩陶文化影響的地區類型或考古文化。對比其時尚渺無人跡的成都平原, 此時的橫斷山脈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 也與北方有更深的聯繫。



圖四：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遺址

(改自成都、阿壩 2016, 2, 圖 1; 成都等 2013, 1, 圖 1; 葉茂林、羅進勇 1999)

¹⁰ 同在岷江上游支流中尚有許多約與營盤山遺址同時或稍晚的小型遺址或採集點, 如安鄉遺址及黑水河上的官納若、色爾古遺址 (成都等 2007a)。其中安鄉遺址發現有細泥紅陶之彩陶瓶、彩陶盆及大口罐, 陶器樣式也能再細分為二期, 分別接近仰韶文化晚期與馬家窯文化, 上方更疊壓了石棺葬的文化層 (成都等 2007a, 2017a)。

林圭偵

有些遺址中，還可見到長時期延續利用的情形，如汶川縣的龍溪寨遺址（汶川等 2017），和上述營盤山遺址，地層中既有仰韶或馬家窯文化中的彩陶、小口細頸瓶和細泥紅陶；上方還疊壓著距今約四千八百年前生產的夾砂陶花邊口沿罐、泥質灰陶、戳印紋、侈口罐。後一階段已經沒有彩陶，其器形和裝飾風格¹¹常被學者援以為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源頭（如黃昊德、趙賓福 2004；江章華 2004, 2015；陳劍 2007a, 2007b；何錕宇、鄭漫麗 2014；何錕宇等 2016）。

然而藉由岷江、大渡河等諸江支流雖然串連了橫斷山脈南北和位於下游的成都平原，但細究其中的地形變化與高度落差，實則容納了多種生態區位與生業型態，反映於各類生產器具的組成和比例，例如川西北多高原，川西南則多山谷；或如營盤山遺址因三面環水，而較其他山間遺址富於淡水資源，這些環境資源也反映於動物骨骼遺留（何錕宇 2015a）。生態之外，即使聚落間互有影響，地區間的文化差異也不宜一體視之。例如橫斷山脈南端受到甘青地區的影響，便不如岷江上游為多。以近來在鹽源盆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飯家堡遺址而言（ca. 2900-2200 cal BC）（成都等 2017b；周志清等 2019），在陶器風格上便同時具有北方和雲南西北部文化的色彩，在不同程度和比例上調和了數個周邊地區的文化。這或許是由於鹽源所在為多條支流會合的盆地，形成另一個文化上的匯流點。

基於地理位置和天然資源發展而成的匯流點，可能並不限於一處。在新物種與技術發明紛至沓來的時代，發掘這樣的匯流點具有特殊而關鍵的意義，許多新發明和物種的引進，對中國西南甚至東南亞大陸都形成更深刻的影響。並且不僅是新石器時代，多元匯集的遺址在之後的青銅時代中，還可見於其他地點，顯見橫斷山脈作為交通要道的重要性，但各處所顯現的政治社會意涵則不盡相同，將在以下營盤山遺址人祭坑和牟托一節進一步討論。

另一方面，多條江流除了溝通橫斷山脈南北，順岷江而下經成都平原匯流長江之後，更可往東通行至重慶；在此又可藉由嘉陵江及其支流往北達於漢中盆地；或續往東達於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因而藉由河道，成都平原（或許還有川中丘陵）也成為南北和東西向交通會合的一處十字路口。但這是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成都平原發展出初步的水利措施更往後的事了。

¹¹ 如斂口鼓腹罐、侈口花邊罐、喇叭口高領罐、高領壺形器、瓦楞紋盆等。

（二）窗含西嶺：新石器至青銅時代的成都平原

在初有人居的平原上，桂圓橋遺址所在聚落 (ca. 3100-2100 BC) (四川等 2013；萬嬌、雷雨 2013)，還曾與岷江上游的下關子遺址 (成都等 2007b, 2008b)、沙烏都遺址 (成都等 2008a)、白水寨遺址 (成都等 2007b, 2008a) 等，並存過一段時期。在這些聚落中，粟、黍仍然是最重要的飲食來源，這也包含最初發現稻米的桂圓橋遺址二期。此時的成都平原仍與岷江上游的穀物組成一致，生業型態上的相似也是部分學者將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源頭，指向營盤山遺址的原因之一。

稍晚於桂圓橋的寶墩文化，早期聚落 (ca. 2500-2000 BC)¹² 亦是沿平原周緣或地勢稍高之處發展起來，處於利於防水的位置。除了具備可能是防洪性質的城垣，也發現可供調節水流並利於灌溉的人工渠道 (成都、新津 2016)，呈現出不同於前的聚落型態，和更大規模的人為改造地貌。此時雖然洪水痕跡仍偶見於遺址地層，¹³ 然而整體上，成都平原無疑已由「不宜人居」的狀態逐漸成為人口富集之地。比起單純栽植小米，以稻作為主兼而搭配其他作物的生業方式，很可能支撐供養了更多人口 (d'Alpoim Guedes 2011；霍巍 2009)。¹⁴ 由考古資料可發現，此時不僅遺址數量增加，範圍也有所擴大，¹⁵ 暗示人口可能有所增長 (成都、新津 2011；江章華 2015)。由寶墩文化一期發現的稻米已是成熟的馴化種來看 (石濤 2012, 35-37；亦見何錕宇等 2020)，其引進可能在更早階段，或許由長江中游透過中介者引入。長江中游為最早栽培稻米的地區之一 (如趙志軍 2002)，加上其築城技術與陶器類型也在此時傳入四川盆地，使此一來源顯得更為可能。¹⁶ 而由這些長江中游輸入的技術叢集，也顯現彼時成都平原接觸到的外

¹² 如寶墩文化中的寶墩 (成都等 2000；成都、新津 2011, 2012a, 2012b, 2016；何錕宇 2015b)、芒城 (成都、都江堰 1999；中日 2001)、高山 (成都、大邑 2015a；周志清等 2015；劉祥宇等 2017)、鹽店 (成都、大邑 2015b, 2016)、紫竹 (葉茂林、李明斌 2002；成都、崇州 2016) 等城牆聚落，及三星堆一期 (陳顯丹 1989；孫華 1992)。

¹³ 即使至青銅時代，一些遺址中都曾發現河沙泥流沈積的現象 (如江章華 2015)；至進入歷史時期後，儘管已有李冰治水闢田，但在西元前一八五年至西元一九四九年之間，見於文獻的洪水紀錄便有近 4,000 筆 (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等 1993, 17)。

¹⁴ 主要作物搭配其他次要作物以降低生產風險的現象，也可見於如長江下游，為漫長的稻米馴化過程中人為所採取的生業策略 (Fuller et al. 2007)。

¹⁵ 如寶墩遺址的外城牆 (成都、新津 2011)。

¹⁶ 然而若要確知源頭，近年來發掘的鹽源飯家堡遺址、桂圓橋遺址、高山遺址 (2487-2042 cal BC)、以及其他四川盆地周緣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可能是這項缺環上待補的關鍵。其

林圭偵

來文化影響，已不再以川西山區為主要來源。此種轉向經三星堆文化（1600-1100 BC），再至十二橋文化（1200-800 BC）尤為明顯。

進入青銅時代之後的三星堆文化，其玉石原料雖然可能來自川西山區，部分陶器器形則呈現與峽江地區甚至峽江以東互動的結果；青銅器製作技術及部分產品，更明顯與黃河中游文化有所聯繫；其中或許有些產品或器物原型是透過長江中游或漢水上游輾轉來到（如江章華、顏勁松 2003；魏京武 1993）。此時的三星堆聚落已蔚為區域文化的中心、權力與財富集中之地（Flad 2012），一改寶墩文化晚期以來聚落分散的局面；與寶墩文化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是斷裂大於延續（如江章華、顏勁松 2003；俞偉超 2004），但在政治結構變動的同時，也許仍然承襲了部分寶墩文化時期的交換網絡，尤其在東向的經營方面，留下許多互動的證據（Falkenhausen 2003；孫華 1999, 2000）；西向方面，則已看不到太多來自川西山區的影響。相反，此時川西山區相對沉寂，僅有少量三星堆文化的陶器見於石棺葬墓地中，如汶川縣昭店村（葉茂林、羅進勇 1999），但為何時到達則還缺乏直接證據。及至十二橋文化時期，成都平原的影響力除了四川盆地，在鄂西地區雖稍有退卻，但仍可及於三峽東部；往北也有所擴張延伸，於陝西南部均可發現相近的文物遺留；往西於川西山區也有所深入。其中陝南和峽江地區已有較多的討論（如羅泰 2011；孫華 1999, 2000），而與川西山區的關係正是本文希望再行補充之處。

由三星堆和十二橋文化的物質文化來源和分布來看，便可窺知當時的文化傳播方向已有所翻轉——手工業生產中心和祭祀活動均集中於現今成都平原，亦即三星堆、十二橋和金沙遺址所在的聚落群（圖一、圖五）；川西山區則可能提供部分手工業原料，同時也接受或模仿了來自中心聚落的器物。例如在雅安沙溪（四川等 1990）、漢源麻家山和麥坪村（大渡河 2003；中國等 2006）（圖一）等遺址，發現有十二橋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尖底器。在麻家山和麥坪村遺址中，更可發現當地聚落先後受到馬家窯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影響的轉變（中國等 2006；亦見劉志岩 2012）。川西山區由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可能源頭之一，轉變為成都平原此一新興中心的附屬邊緣，甚至是文化接受者；反觀其自身的物質文化對成都平原則似乎較缺乏影響性，二區域間的互動似乎並不對稱；也看似頗為符合早期對世界體系的想像——不均質的人口、資源、技術，產生不對等的區域分工和交

中前三者皆曾發現比寶墩文化一期為早的稻米遺存，或許之後的考古工作可循之尋找更多線索。

換經濟 (Wallerstein 1974, 38; 亦見 Stein 1999, 10-11)。然而其中二者所扮演的角色和自主性仍有值得討論之處。

由手工業生產、居住單位及墓葬群的區隔來看，十二橋文化時期的金沙聚落中心似乎納入了更多元的族群，除了本地自寶墩文化時期起便存在的小村落居民，可能也包含了三星堆文化的「遺民」，¹⁷ 和來自峽江地區的「移民」。但相較於後來秦漢時期以帝國之力所動員的移民，此時的移民可能較為鬆散自由，在缺乏中央政府的強力介入之下，每次納入新的移民也都需要社會自體的重整與重新協商 (參考 Stone 2015, 2)。這些不同原因形成的分群，表現於細微的空間區隔及手工業產品的製作規範上 (Lin 2019)。他們生產一致性最高的陶器，卻有最多元的產品，包含埋藏於祭祀區中的貴重物品，更吸收了外來的祭祀套件。由三星堆和十二橋文化中，居民傾盡財力的祭祀方式 (四川 1999; 成都等 2018) 可知，祭祀活動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動。儘管二者所用的祭祀禮儀套件不盡相同，然而為生產祭祀所需的手工業活動，以及附帶而來的盛宴，無疑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而這些活動及其中的資源運用，也為不同社群間創造協商的空間 (Lin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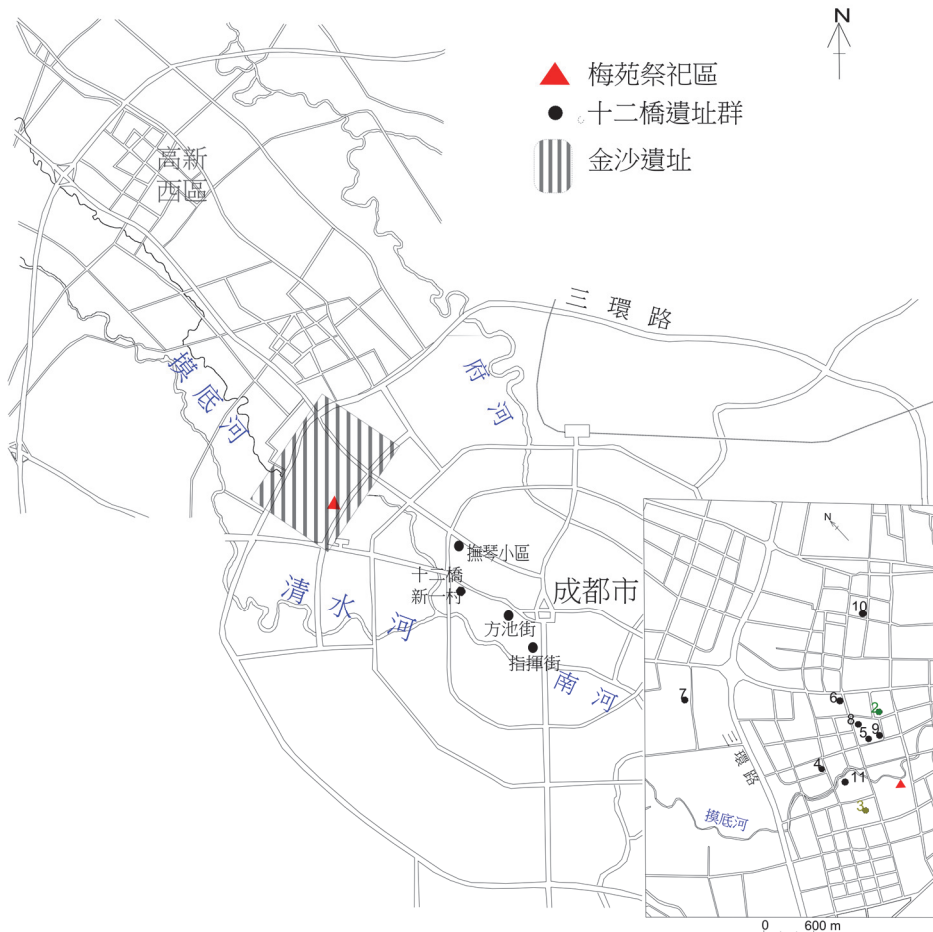
除此，在這個都會區的周遭，尤其在金沙遺址群西北側，還沿郫江故道 (部分重疊今摸底河) 散佈著許多小村落 (圖五)，¹⁸ 自寶墩文化晚期起便維持相同的樣貌，至近代以來依然如此。這些多數為耕地的小村落，具備簡單但完備的生活機能，不僅自給自足也似乎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性。Richard Edmonds (1985, 20) 將類似這種處於已定居但未開發的地區稱為 *ecumene*，別於同心圓式的外圍邊緣 (亦見 Feuer 2016, 6)。而在更接近聚落中心的近郊，許多地方如指揮街遺址 (四川、成都 1987) (圖五) 也發現了儀式用品例如卜甲與 (玉) 石琮，顯示生產、使用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符碼並未遭到壟斷；這些儀式用品的使用雖然多數集中於金沙遺址祭祀區，但也未限於此，可能暗示了決策機制的鬆散與臨時性 (Lin 2019)。另一方面，在金沙遺址梅苑祭祀中心周遭，則分散著墓地、手工業製

¹⁷ 在十二橋文化早中期，也是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埋藏之後，三星堆聚落雖然仍有人群居住，但部分人口很可能疏散至十二橋遺址群所在。因此，十二橋遺址早期的物質文化幾乎如同三星堆遺址。

¹⁸ 主要集中於今日成都西北郊的高新西區，如國騰二期商周遺址 (成都 2005a)、大唐電信二期 (成都 2005b)、格威藥業一期新石器遺址 (成都 2005c)、萬安藥業包裝廠商周遺址 (成都 2005d)、新錦屏包裝廠地點古遺址 (成都 2006)、普天電纜古遺址 (成都 2008) 等。

林圭偵

作場所，甚至種植穀物的耕地（姜銘等 2011），說明儀式空間並未受到專斷性地利用，而是搭配了多種活動。¹⁹



圖五：十二橋文化時期成都市及近郊之遺址分布，
其中十二橋／新一村遺址與金沙遺址相距約 5 公里

（右下為金沙遺址放大：▲ 梅苑祭祀區；2: 三和花園；3: 蘭苑）
（改自成都、成都 2017, 12, 圖 5；Flad and Chen 2013, 97, fig. 4.9；
Lin 2019, 372, fig. 2）

¹⁹ 相對於多元使用的空間，空間特化 (site specialization) 指在空間上僅有單一或有限的用途 (Muller 1984, 490-491; 1987, 15; Flad and Hruby 2007)。

因此，雖然就祭祀埋藏的密集程度、人口集中度和組成多樣化、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分工及產品的精緻度，以至陶器的標準化程度而言，金沙祭祀區和十二橋大型房址所構成的地區，無疑是區域中心所在 (Lin 2019)。然而這是一個不符合我們現代想像的都會中心，位於中心的聚落並無完全集中的權力核心、也未有控制外圍聚落的跡象。外圍的聚落長久以來也維持基本的運作，未被吸收為都會區一部分；二者在功能和界線上僅是模糊的，互依性似乎也並不強烈，並無明確的「城鄉」之分可言。²⁰ 事實上，相較於帶有城牆的寶墩文化城址及三星堆遺址，或者黃河流域更早發展起來的城牆，十二橋文化諸遺址都沒有發現這樣的實體建築存在。如此模糊的界線是否影響都會區界定自我範圍與區別他群？我群與他群的界線存在於何處或如何隨時變動？凡此皆不是能清楚得知而值得探討的。我們更無法臆測發現有十二橋文化經典陶器的橫斷山脈遺址，是否就屬於此文化的一部分；就如同營盤山遺址是否屬於甘青地區文化一樣曖昧不清。但可以推測的是，遠離中心的山區仍能隨其所能，製作具有文化象徵性的器物。我們或許也無從確認山區在何時成為成都人既是邊緣又是祖先所居之地的想像；正如 Mary Helms (1988, 21-22) 提到，英雄祖先等特殊的人，總是住在外緣。但若因此認為此時的山區已失去歷史舞台或僅有零星的聚落點，恐怕是由於大眾視野長期對此地缺乏關照，以及考古工作的不均衡所致。在近年考古工作以及民族誌調查持續累積之下，我們或許有可能為早期的西南方絲綢之路增添更多細節。

(三) 積雪猶存：青銅時代的川西山區

在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南向傳播的盛勢之後，也是在約當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逐漸興起的時期，岷江上游地區的北方文化似乎呈現退縮的狀態，此時遺址如上述下關子、沙烏都等遺址，都已無彩陶發現，而以繩紋及花邊口沿裝飾為主，漸漸接近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陶器的特徵。然而若時代再往後推移，仍有一些發現顯示南北交通並未完全中斷，尤其是流行於甘青地區的標誌物——雙耳罐，²¹ 也常見於川西。例如約與十二橋文化同時的川西南大洋堆遺址中 (西昌等 2004；

²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2008, 210) 指出，完整功能的「城市」和明確的城鄉界線，直到秦朝統一之際才產生。關於城鄉關係的論述還可參考 Richard Blanton and Lane Fargher (2016, 160)。

²¹ 「雙耳陶罐」僅是概括式的稱呼，實則在北方不同文化和階段中，又各有紋飾和器形上的變化。近代調查者以「羌人陶器」稱之 (見鄭德坤 [1946] 2004)，與此地長久以來被視為古羌族活動空間有關。

林圭偵

姜先杰 2007)，可見到北方齊家文化 (ca. 2500-1500 BC)²² 的陶器；在營盤山石棺葬和器物坑中，也可見到帶有寺洼文化 (ca. 1400-750 BC) 風格²³ 的雙耳陶罐 (成都等 2013；亦見李水城 2011)。二者均顯示川西與北方的交流直至青銅時代仍有存續，並且更南下深入至雅讷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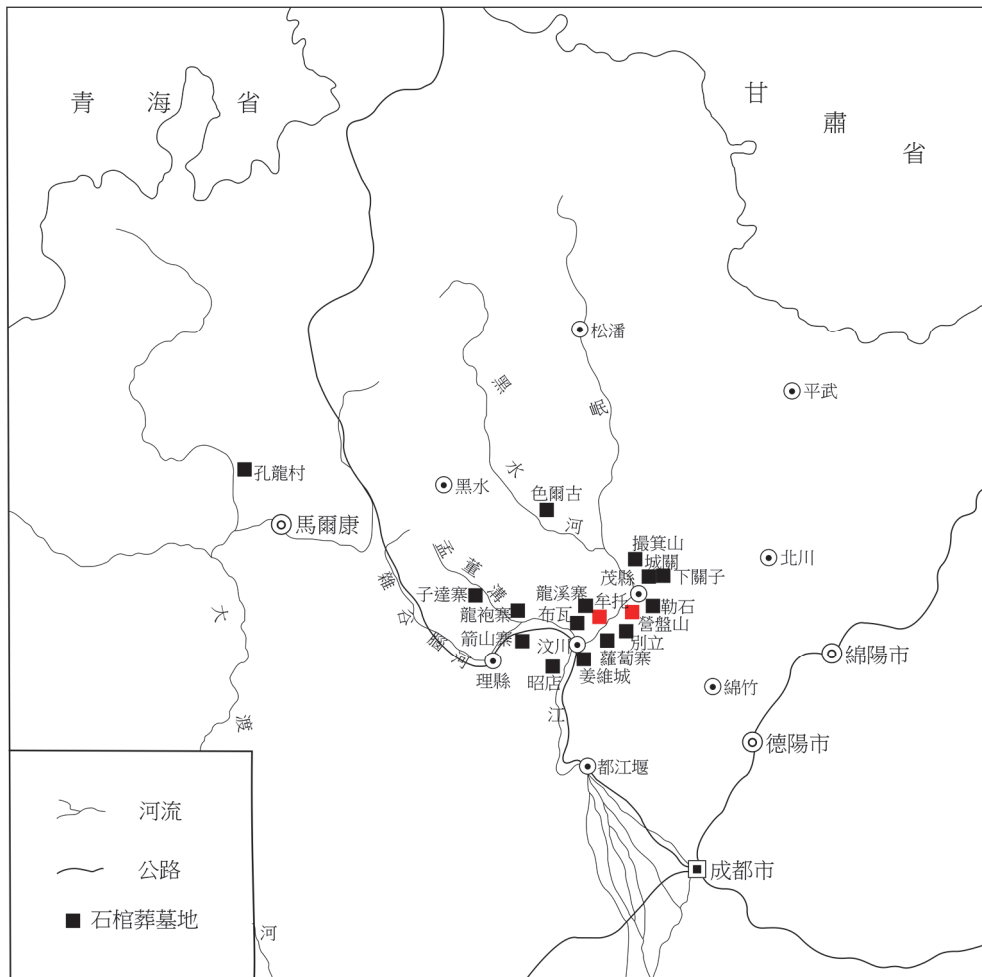
到了十二橋文化中後期，²⁴ 不同於平原地區漸漸流行起船棺葬，山區盛行的是石棺葬，並且如同船棺葬，也有不同的形式——在上下四邊之外，無蓋板者有之；無底板亦有之；有些以細沙墊底、有些墊以石灰石；有些加裝了數層頭箱擺放隨葬品；有些則全無頭箱，而將隨葬品擺置身週；或許因應地區資源不同，石板取材也有所不同；也有不用石板而以石塊壘砌者。在近代以來的調查中，石棺葬時常比新石器時代遺留更容易被發現，除了因時代較近、較接近地表，也因其數量遠較含有新石器遺留的地點為多、²⁵ 分布為廣；加之其葬具多為板岩、頁岩或片麻岩築成，不易隨人骨朽壞，容易在村民耕作掘地的勞務中曝現。事實上，許多地點先是發現了石棺葬，才進而又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陶片和打磨石器，二個時期遺址常有疊壓打破關係，顯見選址邏輯上的相似。根據一九二〇年代以來外國傳教士、探險家和調查者的紀錄，他們已注意到當地農民翻土時，常有石器和半兩錢同時被帶出地面的情形。或如茂縣文化管理所先是一九七九年在營盤山遺址清理了十座石棺葬和器物坑 (成都等 2013, 7)；至二〇〇〇年調查時又於同一地點下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者提到，該地石棺葬未加底板，墓葬又時常打破新石器時代的灰坑和地層，因此而將新石器時代遺物誤為石棺葬的隨葬品有之 (成都等 2013, 261)。此外如茂縣營盤山墓地、別立墓地、下關子遺址；理縣箭山寨遺址、龍袍寨遺址；汶川縣龍溪寨遺址、布瓦遺址和姜維城遺址；黑水縣色爾古遺址；馬爾康縣孔龍村遺址等，也屢見石棺葬直接疊壓於新石器時代地層之上 (圖四、圖六) (關於 2000 年的調查結果見陳劍等 2004；陳學志 1994；馮漢驥、童恩正 1973；汶川等 2017)。

²² 齊家文化是繼馬家窯文化之後流行於甘肅、青海、陝西一帶的文化，其文化受到中西亞交流的影響，也轉而衝擊了中原青銅文化 (Fitzgerald-Huber 1995, 2003)。

²³ 亦流行於中國西北方，其陶器風格最著者為罐口俯視呈尖核桃形、側面看則呈「馬鞍型」的雙耳罐 (中國 2006)。

²⁴ 或新一村文化時期 (ca. 900-500 BC)。

²⁵ 四川省考古人員在二〇〇〇年為編寫《四川省文物地圖集》所展開的文物普查，共發現含有文化堆積層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53 處，採集點 29 處 (蔣成、陳劍 2001；亦見江章華 2004)，其中以雜谷腦河最為密集。



圖六：岷江上游石棺葬

(改自葉茂林、羅進勇 1999；成都等 2013, 1, 圖 1)

這類石棺葬經常形成專門的墓地，並且即使非形成於一時也能排列有序，方向大都一致朝向山頂（徐學書 1998, 223-224），應是有所規劃或有共同的信念，或許與利用該墓地的社區形成對應的社會關係或秩序。在如 Arthur Saxe（1970；亦見 Brown 1995, 15）等學者眼中，專用墓地的發現常能揭示一社會或合作團體（corporate groups）如何納入成員，除了藏有團體之間的連結，也宣告了對資源的所有權。而這些「大石墓」或許在很早就已進入成都人的視野和歷史記憶之中，《華陽國志》提及蠶叢說：「死，作石棺、石椁。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椁為縱目人冢也。」（《華陽國志校補圖注》，118），以此連結葬俗與特定族群。然而石棺葬的分布不但見於岷江上游，近年也陸續在甘肅、青海、西藏、雲南、貴州等地發現。考古學者藉其時代及地理分布所勾勒出的文化傳播帶，是以新石器時代在甘青地區發現的石棺葬為始，²⁶ 到橫斷山脈中南部（川西山區、雲南西北）已大部分進入青銅器甚至鐵器時代（如童恩正 1987）。其中常見的隨葬器物，如型態不一的雙耳陶罐，因具有強烈的北方文化特色，也成為辨認北方因素在川西高原隨時間進退的重要依據。早期學者在注意到這項特殊葬俗分布廣大之餘，亦察覺隨葬器物所顯示出的區域聯繫，如鄭德坤（Cheng 1946；亦見鄭德坤 [1946] 2004, 78-99）很早便認識到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同時具有草原和中原文化的特徵，與甘肅洮河流域的器物，也有相近之處。²⁷

在涉及如此廣大的地區，所屬年代亦跨時極長的情況下，²⁸ 石棺葬此一籠統的稱呼，可能實際上概括了不同的族群，或有不同的文化來源，或長期受周邊文化不等的影響，產生特化的物質文化，反映於葬具的形制、隨葬品的潮流等，以致學者間歷來對石棺葬分式、分期和源流多有看法（如亞當史密斯 2001, 88；李水城 2011；羅二虎 2012, 34；徐學書 1998, 224-228；亦見成都等 2013, 267）；加上近年的考古發現²⁹ 似乎並不符合「愈往南時代愈晚」的假設。

²⁶ 如甘肅張家台（甘肅 1976）、青海宗日（青海、海南 1998）。

²⁷ 鄭德坤並首次以「版岩葬文化」、「理番文化」統稱之（“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tan”）。

²⁸ 其中尤以岷江上游跨度最長，早自新石器時代晚期，晚可至西漢中晚期。

²⁹ 例如位於馬家窯文化外圍的青海宗日遺址，其石板與木板混合搭建的石棺葬形制，似乎比馬家窯核心地區形成更早（見李水城 2011）；又如在滇西北發現的幾處石棺葬，如位於金沙江流域上的永仁磨盤地遺址（雲南等 2003），和位於會理的猴子洞遺址、大劈山墓地（劉化石 2018a, 2018b），時代均較過去認識為早。

即使同在岷江上游，在不同時期，也呈現不同的隨葬品組合和墓葬排列方式。例如江章華 (2011) 指出，愈到後期，二墓並排的情況取代單純的成排埋葬，並且二墓中通常一墓出兵器、另墓出紡輪，可能暗示社會結構的轉變與分工的特化，說明墓葬可能反映所屬社會組織與死者社會身分。³⁰ 也可見石棺葬的形式與內容結構變化頗多，需就各時、各地墓葬小心辨別。尤其因一些墓地在歷來農民耕作翻土之下，已失去清楚的層位關係，加上青銅時代晚期的墓葬有時也隨葬了新石器時代或青銅時代早期式樣的石器、³¹ 陶器（例如茂縣牟托村之石棺墓〔茂縣等 2012〕），在地層受到擾亂或缺乏人骨作為定年依據之下，石棺葬的年代往往不易釐清，其形式的多變與牽動多種來源人群，也使本文所舉研究案例有加以重新認識的必要。

二．「聖地」的（再）建構

後世歷史文獻每將立足於成都平原的「蜀」，其族群發源史推至諸江起源的川西山區，或許這些去古未遠的傳說並非全無所本，而是反映了當時所見的若干物質聯繫，例如章樵注〈蜀都賦〉引《蜀王本紀》言：「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上述《華陽國志》中更清楚表述了蠶叢與石棺葬的連結，將蜀的來源繫之岷山、繫之石棺葬。或如揚雄《蜀王本記》中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³² 其中汶山或岷山均將聖王所居指向岷江上游一地。水利或水患作為最攸關成都平原聚落興廢的自然因素，或許使禹治水聖王的身分格外受到突顯，也使蜀人得以透過禹與黃帝產生聯繫（王明珂 2002）。聖王與山、山與江水源頭的連結，一直是許多文化中將山轉化為神聖空間的要素（見 Jacobson-Tepfer and Meacham 2017）。例如商代甲骨中可見祭山以求雨的卜辭，而常以瘞（燎）祭為之（陳夢家 1988, 594-596；常玉芝 2010, 159），可能由於山為雲氣之所繫，能出雲為風雨。陳夢家 (1988, 596) 也注意到數個山川神名和先公名稱的重疊，猜測此等先公可能為山神、地祇。由成都平原望眼可及的「西嶺雪山」，以及「玉壘

³⁰ 關於死者的社會身分、與社會上其他成員的連結，相關討論可見於 Lewis Binford (1972, 225-226；亦見 O'Shea 1984, 4)。

³¹ 尤其與生業活動關聯的石器在型態上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

³² 《史記正義》引。

林圭偵

（山）浮雲」³³ 般的雲霧仙鄉，亦是神化祖先的居所，並與當前的世系產生連結，產生更為鞏固的世系組織與社會秩序，合法化此世系或地方社群的政經地位及對地方資源的佔有（Bloch and Parry 1982, 36；Saxe 1970, 119；王明珂 2002；亦見 Brown 1995, 5, 13）。然而「先人」之地並非只是靜謐的雲端，或只為成都平原提供山中珍產。

在成都平原逐漸發展為特色鮮明的區域文化時，其聚落中心也以祭祀活動凝聚了更多的人群，形成在文化上能對外識別的共同體。動員大量勞力、集結眾人的大型祭祀活動或許是部分人獲得權力的來源（Chang 1983, 107），例如青銅時代三星堆遺址（ca. 1600-1100 BC）和金沙遺址（ca. 1000-800 BC）所在的聚落中心，儘管祭祀的對象或許不同，但皆因長期、反覆地埋藏器物，形成獨有的祭祀坑或祭祀區，並因蘊藏最多的珍貴器物與象徵符號，暗示其為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在此舉行的活動、事件與參與的人員，能夠形成共識，並具有界定社區成員與範圍的功能。在這些祭祀空間的儀式用品中，除了外來品與具有特殊意義的動物，以人為犧牲可能也是祭祀活動的主題。³⁴ 藉由精緻的工藝、儀式展演的加乘，物品也被賦予實質價值之外的社會價值。例如來自橫斷山區的玉料，成為許多成都平原儀式器物的原料來源，即後世所稱龍溪玉、汶川玉者（成都 2017），這些玉料經過精細的加工最終埋藏於三星堆祭祀坑或梅苑祭祀區，成為重要的祭祀用器。

然而山區做為原料供應者僅是與平原維持的多重關係之一，此時的山區即使不像平原般人口密集，但由大量呼應當地地景並具有一致性的墓葬安排，也暗示了社區秩序與組織性儀式活動的存在，在這些以墓葬為中心而營造的儀式活動和隨葬品中，也應投注了許多勞力、物力及交換網絡。這促使本文特別注意山區聚落如何運用多樣的本土和外來物品，包含外來符號，融入自己的意識型態和社會背景，甚至促進其流動，造成相似的葬俗、器物在廣大的區域間延伸；提醒我們避免將山區極端化為「被剝削的邊緣」或「被動的文化接受者」（見 Stein 1999, 2002），而同時也應注意涵蓋在如此廣袤地區之下的多元群體，有其不同的生存策略、人我分際與族群關係。

³³ 這可能是杜甫在西元八世紀間所見到的窗外山景——夏季仍可見到積雪的橫斷山脈。

³⁴ 如據本鄉一美（1999, 522）觀察，三星堆祭祀坑中也似有人骨遺留。或如前述作為奠基的犧牲，見註 8。

(一) 雪山的回望之一：營盤山遺址的「人祭坑」

1. 「人祭坑」的儀式與社會意義

對關係社群而言，葬禮不只是物理性的毀壞或埋藏軀體，更重要的是葬禮作為儀式對生者所產生的作用，以及儀式的社會意義、賦予其意義的意識型態，和牽涉其中的人際網路。經由小心辨析，或許可發現墓葬遺跡和相關的儀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處的社會結構 (Morris 1992, 1-2)。在前節新石器時代營盤山遺址中，筆者曾述及公共空間及人祭坑的存在，與二者間的關聯。以人作為犧牲的現象在世界各地並不罕見——在特殊（神聖）的空間，由專職儀式人員引導，藉由儀式生產與超自然相關的意義；或公開或秘密地向社群成員傳達慶祝、祈求、除疫、除災、懲罰或撫慰等訊息，其帶有展演與溝通的性質自不待言。溝通的對象不僅是神靈，同時更是儀式操作者、「受難者」與觀看者 (Hatch 2012, 202)。當這樣的神聖空間和活動具象化為物質遺留，可能包含了儀式器物、紀念建築、特殊墓葬和陪葬品等 (Pearson 1999, 193)。例如營盤山遺址中扭曲變形的人骨埋藏。在此地反覆發生的此類墓葬說明，儘管成為犧牲的對象有所不同，但相關的儀式行為可能是相似的，犧牲者的個人特質也一概被抹除，反映埋葬儀式所帶來的不僅是宗教儀式上的意義，且是某種社會意義的再生產，包含周圍社群政經權力的再分配、社會關係的改變與重組，以及個人身分或族群認同的形成與再確認。

對於何謂「祭祀坑」或何謂人祭與人殉的區別，自殷墟發掘以來多有討論，更有學者仔細區分陪葬、殉葬及祭祀（人祭或人牲）的不同，認為其社會階級依次而下，來源亦不同。其中人祭或人牲可能是奴隸或外來的戰俘，殺之以祭告神靈或祖先，祭祀對象可能是綜合性的；並且不同於陪葬或殉葬時與特定的死者連結，人祭或人牲舉行的時間不必然緊接祭祀對象的死亡，空間也經常遷就主祭者所在（權力中心），可能遠離實際祭祀對象的墓葬。當反覆舉行則可能形成特殊的儀式空間和事件（見黃展岳 1990, 84；王平、顧彬 2007, 8-9；楊寶成 2002, 105-118）。因此人祭之有別於人殉之處，不但是與祭祀對象有更遠的社會關係，還在於時空上的遠離；此種遠離一方面也使祭祀對象更加抽象化與神秘化。除此之外，人祭也比人殉更加抽離當地的人群網絡，犧牲者的個人身分變得不重要，而更為接近一般宗教的祭祀儀式，當一再重演時，累積為週期性的活動，其動員影響的經常是社區全體，而非如特定死亡事件般，僅牽涉死者周邊的人際網絡。

相較於此，英文中的 human sacrifice 或 ritual killing，並不特別區分人祭和人殉為外來或內在（如 Pearson 1999, 17；Hayden 2018, 39）。但二者的共通之處，可能是都帶有強烈的神秘性和儀式性，藉此合理化犧牲生命的行為（Jensen [1951], 引自 Mack 1987, 3）。也許用於誇富宴，從而展示財富、權力，伸張己身的影響力或加強群體的凝聚性，歷來對其社會「功能」已多有學者闡述（如 Hubert and Mauss [1899] 1964）。即使暫不論這些觀點中過於強調人祭或人性維持社會穩定運作的功能論說，仍可看出社會內部的暴力看似違反秩序或道德規範，但同時有其文化邏輯與社會意義（Campbell 2014, 5）；它既是文化上可預期的行為模式，但在發生的當時，也具有社會性的破壞。二種看似衝突的現象恰顯示社會規則容許衝破的空間，與因此而生的變動性（Campbell 2014, 5）。

營盤山的發掘者將幾具葬姿扭曲的墓葬稱為「人祭坑」，認為其具有儀式犧牲的性質，而非相殉於其他墓葬，這樣的指稱除了突顯出受到儀式性暴力對待的軀體，也暗示了這些「人祭坑」為外來人口的設定。尤其西北甘青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便與岷江上游關係密切，加上一般認為古羌族最終是由甘青地區遷移進入川西山區，甘青地區似乎很自然成為人祭可疑的來源（原海兵等 2018）。然而甘青地區與岷江上游的族群界線是我們所不了解的；考古學文化上，岷江上游應自成「營盤山文化」或「馬家窯文化的地方類型」也有所爭議。二者是否應視為不同的「文化社群」？「外來」應該如何界定？這種內外分辨的困難源於族群分界的難以捕捉。以工具性的族群劃分而言，我群與他群的劃分或族群認同的建構，常常帶有行動者的意圖與興趣（Barth 1969, 33；亦見 Jones 1997, 72；Hegmon 1998, 273；王明珂 1997, 12），或社群集體的政治經濟利益考量（Cohen 1974），藉由共同信仰和社會實踐³⁵的促進而形成；維持族群界線也具有生態或社會適應及資源競爭上的意義（Barth 1969, 20；Bentley 1987, 25），這些資源除了是生態或經濟性的，也可能是政治資源。但不論集體或個人，行動者在其時未必有全知通盤的計畫，也並非總是有清楚的功利考量（Jones 1997, 77）。

《史記·西南夷列傳》曾提及：「……北至樸榆，名為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毋駘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毋駘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

³⁵ 例如回憶、神話、價值系統、語言、符號、衣著、建築、生業模式、手工業產品風格等。

也。」(116:2991) 這些描述中所揭示的是自居文明的史家眼中，在川西山區隨畜遷徙、組織低落的多種蠻夷；其中頗有生熟遠近之分，如羌民、生番者（見王明珂 2003, 191），同時也傳達了不同族群與文明中心間不同層次的邊緣關係——「化外之外」。然而這種劃分如 Fredrik Barth (1969) 所指出，並非既定的給予，相反地，需要特意、反覆確認才能維持；或如許多學者所認識到，所謂族群類別僅是特定情境下建構的結果，因此是流動而不固定的（見 Jones 1997, 75）。《史記》中「隨畜遷徙」一方面描述了「蠻夷」的生業型態；一方面也說明他們隨（牲畜）攝食範圍而移動的流動性，以及族群邊界、構成單位的不明與時相重疊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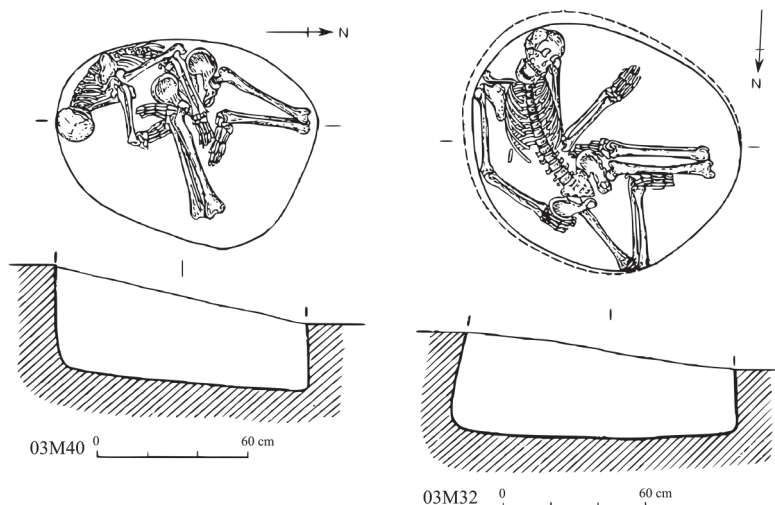
在另一則敘述中這些族群又被貶低混談為不善於耕作穀粟麻菽的「六夷七羌九氐」（《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86:2857-2858）。一方面言其多，但又缺乏細分的必要。如此特意泯滅人群區別，亦帶有扁平化他者的貶低之意；除此之外，也再度顯現了族群界線與歸類的模糊不明，以及在面臨與他人互動的各種情境時，可能產生的不同自我指稱與認同（王明珂 2003）。

儘管如此，由前節中所述營盤山遺址的考古發現，可知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此地均有栽植穀物、果樹和馴養動物的傳統，定居形式的社區規模完整，並非全然「隨畜遷徙」，也並非「毋常處」。其中的廣場和「人祭坑」，性質與三星堆遺址的祭祀坑或金沙遺址的祭祀區或許不盡相同，但推究埋藏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後者藉以取悅或撫慰超自然的神靈，實質上則有化解社區內緊張關係與凝聚共識的作用 (Lin 2019)；營盤山人祭坑則在此之外，更展示了與俘虜及其所代表的群體、區域或政體 (polity) 間的權力關係，成為區域政治角力的場所。這種富有政治效果的儀式性暴力，或許符合「有效的犧牲」（“effective sacrifice”，Herrenschmidt 1982；亦見 Campbell 2014, 23），也可見於其他地區的文化中。距離 1,000 餘公里外的殷墟，可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胡厚宣 (1974a, 1974b) 根據考古發現與甲骨文推算，發現此處使用人祭可能多達 14,000 人以上；唐際根等 (唐際根、牛海茹 2013；唐際根、湯毓賢 2014) 也對甲骨文中的羌人犧牲做了相關統計，並與考古發現相印證，發現在王陵區的人祭坑共埋有至少 6,834 人。至於近在 140 公里的成都平原內，也在高山遺址發現有作為城牆奠基和埋藏在遺址中心附近的人祭坑 (劉祥宇等 2017；周志清等 2015)。這些例子與營盤山所見埋藏於遺址中心的人祭坑，或有可相比擬之處。位於靠近人群中心的人祭坑，當埋藏之時理應引起了整個社區的注目。藉由公開展示和殺殉手段，造成觀者強烈的

林圭偵

的心理衝擊。這些人祭坑與其他墓葬是如此不同，看似在社區中心，向社群成員展演，實則被排除於社群之外；他們的埋藏缺乏一般的墓壙或陪葬品，所需耗費的準備看似較少，然而藉由他們特殊的存在，卻又突顯、強化了社區的整體性和秩序，重申我群與他群的界線。他們所帶有的政治、社會功能，實現了儀式的政治性 (politics of ritual) (Brown 1995, 23)。

為更進一步理解人祭坑所暗示的區域關係，筆者針對保存下來的 M32 (男性 30-35 齡)、M40 (男性 35-40 齡) 進行分析。³⁶ 單看其性別年齡的組成，似符合成年男性較易於衝突中死亡的民族誌觀察和考古案例 (見 Milner 1995, 229)。二具個體與其他暫被命名為「人祭坑」者，均是採非正常葬姿，身體呈現相當程度的扭曲 (圖七)，蜷曲於圓形坑中，無任何葬具或隨葬品。其他僅見於紀錄的人祭坑更有身首分離，或僅有軀體不見頭顱，或僅有頭顱，或肢骨呈綁縛狀等情形；亦有疑似二次葬，僅餘殘肢於圓形坑中者，似乎符合我們對於囚徒以及人牲處置的想像。不但符合衝突所受之暴力創傷 (見 Jackes 2004; Milner 1995)，同時也是一種打破其完整性、去人性化的處置方式 (Brown 1995, 5)。



圖七：2003 年出土人祭坑 M32、M40
(改自成都等 2018, 249, 圖 5-26, 圖 5-28)

³⁶ 原海兵等 (2018) 檢驗二具人骨的體質特徵與性別年齡，發現除了 M40 有股骨外翻的現象，其他無特殊疾病。

儘管此前發掘者已利用遺址新石器時代地層中的木炭進行定年（成都等 2018, 511-512），但由於部分層位已受到破壞擾動，為求謹慎，在進行其他分析前，筆者仍與發掘者共同商議先採行人骨測定年代。定年結果發現二具原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人祭坑」，實為年代更晚的青銅時代人骨（M32: 1100-930 cal BC; M40: 1116-933 cal BC）。³⁷ 同時，利用營盤山遺址上層遺留的石棺葬人牙定年（2003T22②），得到的年代則是 1011-846 cal BC，³⁸ 三者年代彼此接近，均相當於成都平原的十二橋文化時期，也相當於發掘者對於營盤山石棺葬墓地所推測的年代上限，³⁹ 顯示原先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人祭坑，實際上應是由石棺葬時期（青銅時代）的地層擾入，因該遺址地層擾動情形嚴重、墓地和隨葬品延續使用時間較長，才導致判斷的困難。然而儘管年代上有所修正，在排列有序的石棺葬中，埋置人祭坑仍然顯得極不尋常，也使我們必須將注意力及對社會關係的觀察拉至青銅時代。

2. 同位素分析所顯示的食性與人祭來源

這些人祭坑雖然缺乏傳統上賴以判斷族屬或身分的陪葬品，但或許這也避免了此地多元的外來器物的混淆，讓我們得以直視人骨本身。因此筆者團隊就人骨和牙齒進行穩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結果是，碳同位素顯示死者的飲食內容更接近稻作區的人群——以稻為主，粟次之；其碳氮比值與高山遺址的人骨呈現一致（Lee et al. 2020b），而高山遺址的動植物遺存，顯示該地應是以種植稻米和飼養豬為主要生業（姜銘、閔雪 2017；何錕宇等 2020）。隨後我們又以牙齒進行序列性採樣，⁴⁰ 分析個體在幼年期⁴¹ 各成長階段的碳、氮同位素數值，對比由肢骨所得死前數年的數值，得知個體 M32 在幼兒時期可能獲得少許淡水資源（李政益等

³⁷ 委由牛津大學實驗室（ORAU: Oxford Radiocarbon Accelerator Unit）進行。

³⁸ 委由美國 Beta 實驗室定年。

³⁹ 發掘者根據隨葬陶器的類型和文化，並考慮文化傳播需時，推測年代最早在「西周晚期」（成都等 2013, 269），也即相當於十二橋時期。

⁴⁰ 牙本質的生長如同樹木年輪一般，經年由牙冠逐漸往牙根增生，因而若能根據生長紋逐一切割，便能得到不同時間序列間，以年或季節為單位，記載於牙本質中的碳、氮同位素，藉以推測飲食組成比例，獲得比骨膠原更好的解析度。相對於骨膠原（bone collagen）僅能反映死者過世前數年或至多數十年間的平均飲食狀況，牙本質膠原（dental collagen）能保留牙齒生長時，亦即個體幼年時期的營養資訊。對於成人個體若能同時就牙本質膠原與骨膠原配合來看，則能獲得較為完整的飲食情況及生命史（Fernández-Crespo et al. 2018）。

⁴¹ M32 採第一白齒：成長期為 0-3 齡；M40 採第二白齒：成長期為 3-8 齡。

林圭偵

2018, 536, 圖 10-9)，食用稻米也較成年後為多；M40 亦是從幼年起，飲食內容中便包含了不少稻米 (Lee et al. 2020a)。在做這些測試時，我們同時搭配分析了理論上較能反映當地環境背景值的豬隻遺留作為比對（參考 Bentley et al. 2004），⁴² 發現營盤山「人祭坑」的食性，與當地新石器時代馴養的豬隻，或青銅時代的石棺葬墓主 (2003T22②) 均不相同，後二者的碳同位素檢測結果皆是以粟為主食 (Lee et al. 2020a)，符合該遺址新石器時代的植物浮選所得——全為粟黍而無稻米 (趙志軍、陳劍 2011)，也暗示岷江上游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以粟黍為主要穀物的生業型態，很可能由於適應當地生態條件，仍為青銅時代的居民，也即石棺葬的主人所採行。從而更說明人祭坑的飲食不同於當地人群。

由於意識到二具個體來自外地的可能，也因認識到針對一地現生植物進行鋇同位素分析所獲取的比值，可做為當地的環境背景值，⁴³ 指示與之比對的個體是否為外來 (Brönnimann et al. 2018; Schulting et al. 2019; Slovak et al. 2018; Snoeck et al. 2016; Wong et al. 2018)，我們也對個體進行鋇同位素的採集分析，結果是營盤山人祭坑的比值⁴⁴ 與當地環境背景值⁴⁵ 並不相符；但青銅時代的石棺葬墓主⁴⁶ 則與環境背景值相近 (Lin et al. 2022)。再一次指向人祭坑墓主為外來人口，符合其為「人祭」坑的稱呼。

接著我們又在鄰近的成都平原中比對數據，尤其是寶墩文化以降的六個遺址，⁴⁷ 採取共 39 個人、豬的樣本，其中各子區域間雖有細部的差異，但整體而言，成都平原構成一個可識別於山區的區域。經總合這些數據後，發現營盤山人祭坑的鋇同位素更為接近成都平原 (Lin et al. 2022)；而與石棺葬墓主、或營盤山遺址周遭現生植物所呈現的範圍有別。

⁴² 家豬一類活動範圍較小的動物，被認為是小型齧齒動物之外，最能代表當地環境背景值的動物。此外，家豬常接受人類剩餘食物的特點，也有助於定位人骨標本的來源或食物組成。

⁴³ 土壤中的鋇經由植物根部吸收進入食物鏈，因此藉之能顯示一地地質特徵。

⁴⁴ 營盤山人祭坑之鋇同位素為 M32: 0.711858、M40: 0.711923。

⁴⁵ 在營盤山遺址及對岸的沙烏都遺址周遭範圍採樣結果為 0.713323~0.714441，均比成都平原所採植物為高，反映當地高度變質岩的放射性特質。

⁴⁶ 其鋇同位素比值高達 0.715564，符合當地高度變質岩的特性。

⁴⁷ 包含高山遺址、金沙遺址置信金沙地點、金沙遺址陽光地帶 II 期地點、金沙遺址金牛城鄉一體化 5B 地點、紅橋村遺址、新一村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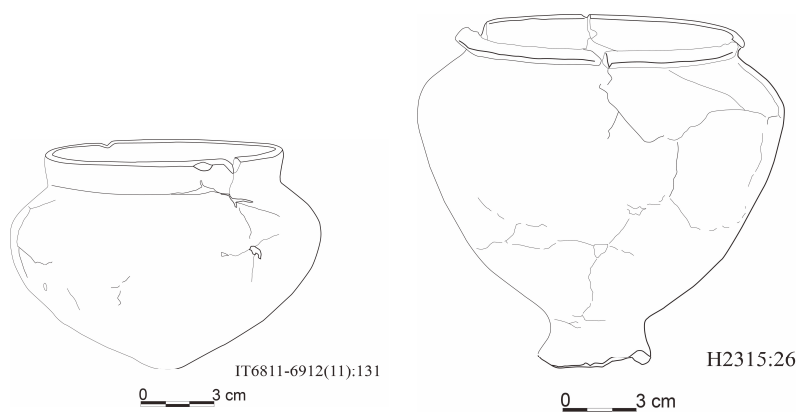
綜合多種同位素所顯示的飲食組成和人口來源，人祭坑的墓主 M32、M40 很有可能在幼年時期生長於盛產稻米的成都平原，青少年或成年後才移動至營盤山遺址所在，或許出於被迫。他們的葬姿和埋藏背景均大異於同時期的石棺葬，也缺乏葬具或陪葬品，他們移動的原因及最終在山區非正常死亡，應是耐人尋味的現象，其間族群關係也值得探討。

3. 人祭坑所暗示之區域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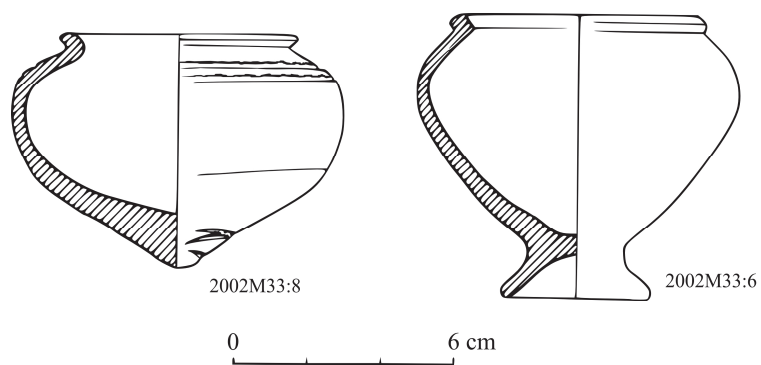
以川西山區和平原在地緣與文化上的親近，平原與山區二地互有人員到達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但當他者以「人祭」的形式進入當地脈絡，則超出過去單由物質文化所能推測的圖像。

儘管川西石棺葬的葬俗可能起源自甘青地區，許多石棺葬的陪葬品直至青銅時代也仍體現了與北方、甚至草原的交流，例如雙耳罐、單耳罐、陶乳丁罐、陶豆等陶器類型；然而同時間，其隨葬品中也不乏來自鄰近成都平原的器物，如汶川縣昭店村的石棺葬，便有小平底罐和尖底盞的發現（葉茂林、羅進勇 1999），二者分別為三星堆和十二橋文化的典型陶器；撮箕山和勒石村墓地也有尖底罐發現（見徐學書 1998）。至於本例人祭坑所在的營盤山石棺葬墓地中，亦有若干墓葬隨葬了成都平原風格的器物，如尖底器、陶簋（圖八）和陶雙耳壺（圖九），均帶有十二橋文化的特質。有時一墓中同時隨葬北方的單耳罐或雙耳罐和成都平原的陶簋（如 2004M11、2004M15）；或有隨葬陶器型態介於陶簋與陶豆之間（如 2006M2:3），融合了北方和成都平原的特徵。這些器物同時呈現了川西山區與甘青、成都平原二個方向的交往。除此之外，亦有一些無法清楚確知源頭的器物，同時出現於此地與成都平原、陝西、西藏，甚至是內蒙古、河北（夏家店上層文化），或許是有共同的來源；但因地域上的長程傳播，可能產生時間上的落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相似的物質文化只佔彼此很小之一部分，個別使用的背景也可能不同，若因此將川西山區與成都平原或甘青地區視為一體，則是低估生態環境對人群的潛在影響；亦未考慮各自社會政治組織、人口組成與生業型態等種種差異。

林圭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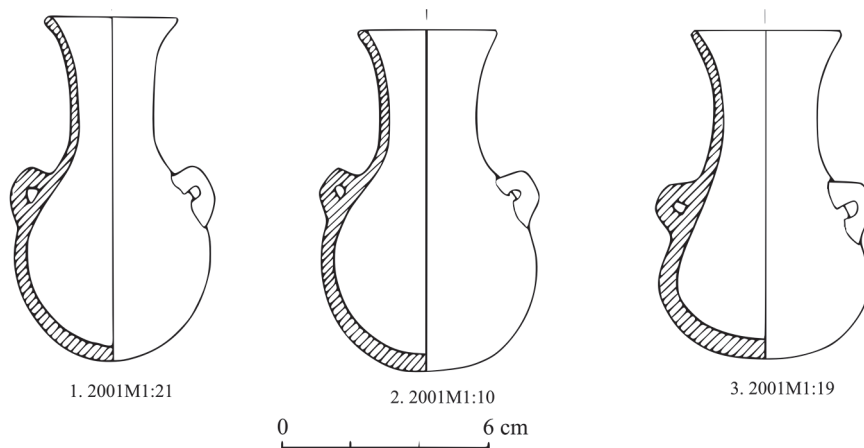


金沙遺址出土尖底罐（左）、陶簋（右）
（改自成都、成都 2018, 335, 354, 圖 8, 圖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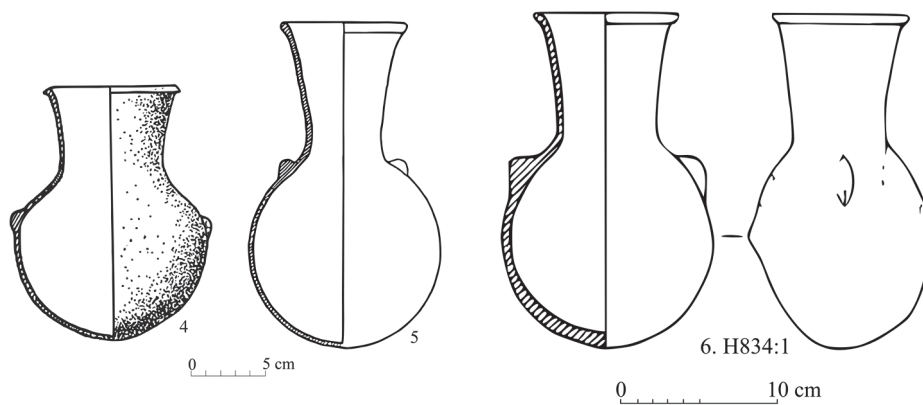


營盤山石棺墓出土尖底罐（左）、陶簋（右）
（改自成都等 2013, 164, 圖 179）

圖八



1-3. 營盤山石棺墓出土陶壺
(改自成都等 2013, 83, 圖 98)



4-5. 新繁水觀音遺址出土陶壺
(改自四川 1959)

6. 金沙遺址博雅庭韻(萬博)地點
出土陶壺(改自成都 2004, 66, 圖 6)

圖九

林圭偵

由營盤山遺址的隨葬品來看，多數是陶器，其他器類僅有少量的石器，唯一的銅鏃出於墓號 2003M14、以及採集所得三件銅兵器。過去 George Milner (1995, 222) 曾提醒：發生於小規模社會間的衝突，往往不易在考古紀錄上被察覺，這樣的窘境可能是由於衝突規模較小，以及區域勢力的不均等，使我們僅能由間接或片面的線索推測判斷。在十二橋文化時期，無論川西平原或山區，考古學者都尚未發現清楚的防禦工事，或許區域間的衝突並未擴大規模。對比其後的新一村文化時期則有所變化，江章華 (2011) 觀察岷江上游石棺葬⁴⁸ 的陪葬品指出，在戰國和西漢早期，隨葬兵器的情形均為常見；但在西漢早期至東漢初期，此一情形被鐵製工具和農具所取代，可能暗示社會間常見的衝突，漸由地方開發所取代。雖然我們無法得知生長於平原的人最終成為山中俘虜的原因，但山區並非任由平原取用、剝削資源或傾銷產品的附屬領地卻十分清楚（比較 Chase-Dunn and Hall 1991, 28）。

山區對平原俘虜的殺害，甚至進一步對死者身體的殘害及公開展示，可能是社群所認可的集體性暴力。若參考 Bruce D. Smith (1986, 1989；引自 Milner 1995, 234) 在北美洲中南部的觀察，帶有創傷的遺骸經常發現於出產重要資源的地方。他因此猜測全新世中期因氣候、水道上的變化，導致族群間因覓食範圍的限縮和重疊而時起衝突。儘管何謂資源在不同的社會可能有不同的認定，但對於重要資源的競爭，是否也可能是川西平原與山區間發生衝突的原因？有無可能當成都平原中心的工匠為製作大量儀式器物，也冒有原料取用上的風險，或需與其他族群競爭或交換？如同佔據不同生態資源區位的族群，所可能發展出的各式關係 (Barth 1969, 19-20)。這與金沙聚落自取代三星堆成為祭祀中心以來，減少青銅器的使用但大量製作玉器，以致對玉料需求增加是否有所關聯？當然推測這其中的任何連結都應更謹慎進行，如同我們也不應隨意臆測山區的社會組織型態與生業模式，而過快產生「隨畜無常處」或漫無組織的印象。

由人祭坑的外部來源而言，人祭坑所涉及的可能既是社區內部的儀式展演，且藉由「他者」增進內部的團結，重塑區域間的關係與權力宣示。若如此，環繞儀式的不僅是意識型態，或因此衍生的權力、財富再分配，亦是超越原本社會關係的界定 (Hayden 2018, 5)。

⁴⁸ 主要材料來自茂縣的城關墓地。

當我們將葬俗視為社會行為的部分展現，即是表明其與「社會」群體的關聯比之「生物」群體更為緊密。因此，當以區域為單位 (Brown 1995, 21) 檢視川西山區的葬俗，或者反過來，以葬俗的差異區別地區人群時，我們或許發現原本界線不明的文化群體，變得比較能夠掌握。當然區域與族群並非完美對應、不再變動，族群界線也仍是不明朗的。當賴以界定族群的文化特徵發生變化時，族群成員的認同和界線也將隨之改變；繼而經由各式場合反覆區分我群與他群，由此形成的界線即使並非客觀存在，也能在特定場合與時刻隱約浮現 (Barth 1969, 14)，並經由族群間的互動得以彰顯。此時，在岷江上游的社會中，殺害俘虜的行為，雖然是社會認可的暴力，卻也在儀式中被賦予特殊的意義。犧牲者在遭受去人性化的同時，被物化為如同陪葬品一般，具有特別的「價值」。此亦是「馴服」俘虜以去除其危險性，使之成為對己有用的過程。移除其人性的意義則是在軀體死亡之外的社會死亡 (Campbell 2014, 99-100)。

在岷江上游，石棺葬的葬俗持續久遠，幾乎由相當於十二橋文化時期延伸至漢初，若干地方甚至至東漢仍有發現；同時期在成都平原上，則在土坑墓為主的墓葬中，逐漸出現帶有木質底板或船棺墓的墓葬類型。石棺葬和船棺葬盛行的時代幾乎是同時的，約是西元前八至三世紀，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地區差異或許是出於資源和地景的因素，也逐漸與特定的人群和認同連結在一起（見 Shennan 1989 關於文化認同的考古學）。但同時，二地的葬式雖有差異，但到了盛行時期尾聲，中、大型墓卻都發展出相同的特色，即埋藏了許多兵器與外來物品。除了暗示區域間的接觸與紛爭加劇外，這些紛爭與衝突可能也為部分人創造了更多的社會權力（參考比較 Linduff and Yang 2012 的案例）。西南邊地以及「邊地的邊地」，從此都捲入一個更廣大的浪潮之中，也提醒我們不能將目光限於山區與平原間的互動，下節所討論的墓葬更具有多元與長程交換的特質。

（二）雪山的回望之二：牟托石棺墓及器物坑埋藏的多元器物

與成都平原相關聯的器物不僅出現於營盤山石棺葬墓地，岷江上游及橫斷山脈的其他地方，不論文化層、墓葬或窖藏中也時有發現，例如同在岷江上游的牟托石棺墓及窖藏（茂縣等 2012）。

牟托一號墓及三座器物坑的組合，於一九九二年發現，雖說此一組合在空間上十分接近，內容物也有所關聯，但三座器物窖藏坑是否為同時期埋藏、與一號墓的關係為何並不容易判斷，也未發現周邊可對應的居址。並且由於缺乏流行時

林圭偵

間較短、可資以判斷年代的器物，學者對墓葬和器物坑的埋藏年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如 Falkenhausen 1996；茂縣等 2012）。發掘者認為一號墓的特徵與營盤山墓地晚期接近，約是戰國晚期，但這些推測所根據的是一些流行時間較長的器物，再加上若干傳播時間。至於該如何定位這些器物的流行使用時期，也和牟托在傳播帶上居於何種位置有關。

牟托墓葬和器物坑的地點是特別的，位於岷江西岸的二級台地、山脊上稍平坦處，附近有人為積石塚（豹圈樑子），除北面靠山外，三面開闊，為一處能俯視周遭河谷的制高點，且不與其他墓葬共用墓地（茂縣等 2012）。在其他石棺葬經常是成群發現的狀況下，牟托一號墓單獨位於高處尤其顯得特殊。據徐學書 (1998, 225) 言，該處積石塚於數公里外的岷江東岸仍清楚可見；相較而言，鄰近的大坪石棺墓地，則地勢較為低緩，隨葬品亦較為平常。因此牟托墓主的地位應有別於一般石棺葬。亞當史密斯 (2001, 35) 認為該墓葬因具備了精緻的陶器，又隨葬青銅器，並且具有頭箱及陪葬坑，均是高級墓葬的指標。除了牟托一號墓，其他如營盤山 M2、M3 也具備這些特徵，但牟托墓葬自成一處更為特別。事實上，牟托一號墓的營造雖然在形制上接近其他石棺葬，但墓壙的深度和棺室上下鋪設的層次，如棺底墊以多層絲帛、毛、麻織物，以及以瑪瑙、綠松石串飾成的珠襦，都顯示出更多人力的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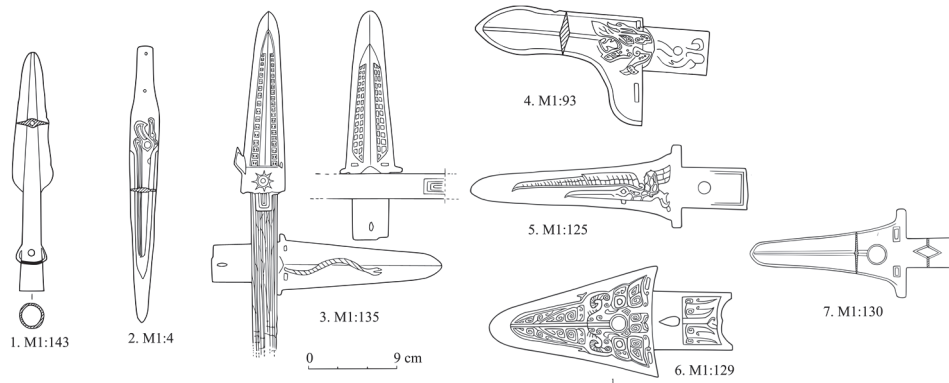
1. 十字路口上的埋藏器物組合

牟托一號墓雖和其他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形制相近，但內含三層頭箱和眾多隨葬品則很不尋常——含器物坑在內，出土器物總數約 250 餘件；其中一號墓佔 176 件，為目前已知隨葬品數量最多的石棺葬。此外，一號墓的底部也特別鋪墊了細沙、竹篾和多層織物，又於最上層的石板棺蓋上方擺置一疊，這些陳設方式更是其他石棺葬所未見。在 250 餘件器物中，金屬器（含青銅器及銅鐵合製器）共 91 件，有 62 件出自一號墓，佔一號墓隨葬品的 35%；反觀最能反映地方特色的陶器，則僅有 50 件，也全出自一號墓，幾乎全放置於頭箱中，陶質細緻、燒製精良，表面經過磨光處理，但就器形而言並不多樣，多數為陶簋、陶杯及小型陶罐，個別器類的造型均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可能為成批生產以作為隨葬品使用。這些器形和紋飾在橫斷山脈的其他石棺葬墓地中也經常可見，如上述營盤山石棺葬墓地中也有許多同款式的陶簋和乳丁小罐。類似的陶器類型分布廣泛，應已經過長時間的流通，形成橫斷山脈特有的陶器風格。

相對於缺少變化的陶器，其他材質器類則顯現出多元的外來色彩，也是牟托墓地最為特殊之處；其中青銅器數量為歷來發現石棺葬之最，可略分為禮樂器、兵器、飾件、馬具；而又以兵器中的青銅戈佔多數。需注意的是，這些分類多為後人依照中原的分類系統所加，未必符合當地的使用脈絡，也未必能反映使用者觀點。以下討論「禮樂器」時，將尤其顯現這種分類的不合宜。除上述大致分類，發掘者又按其特色、來源，將器物分為具有本地特色者，與來自蜀、楚、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等外來風格者（茂縣等 2012, 102-107），顯示此地的輻輳性地位。由這些物質遺留中所見，此時的跨區域交流比之於前似乎更加顯著。以下試由這些器物的來源方向看此地的交流情形：

(1) 由東而來的文化浪潮

橫斷山區與東方的連結雖晚於北方形成，但青銅時代的武器、裝飾品，以及秦漢時期的日常用品，多來自東面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見何錕宇 2018），例如數量最多的青銅兵器——戈、戟、矛和柳葉劍，向來被稱為巴蜀式兵器，在一號墓中佔了 32 件，2、3 號器物坑也各有 7 件（圖一〇）；又如一號墓中的鳥形飾件 (M1:21)，也很難不令人聯想到三星堆的銅鳥。大量的隨葬兵器，顯示了族群接觸地帶的衝突可能相當頻繁，其中又以外來兵器佔多數，或許如 Kathryn Linduff and Jianhua Yang (2012) 所說，外來兵器常被賦予特別的力量。研究者經常將這些兵器定位為西元前五至三世紀的產物，但事實上其分布的時空並不限於此，例如河南、陝西中南部、甘肅也多有發現，時間上更可推至商末周初 (Falkenhausen 1996；羅泰 2011)。雖然引入四川的時間不明，但較早在新繁水觀音遺址（四川 1959）、彭州竹瓦街窖藏 (Falkenhausen 2001；孫華 2002；王家祐 1961) 等相當於西周時期的遺跡中，已可見其蹤跡。這些後來因常見於成都平原青銅時代晚期墓葬，而被稱為「巴蜀式兵器」的器類，幾乎都可在中原地區找到其原型，唯在流行至巴蜀地區後，在刀葉和銜部上發生了變化，也加入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紋飾，並且在其他地區已不再流行這類器物之後數個世紀，四川盆地還保留下來，反而成其特色。更甚者，在牟托，中原的經典風格、巴蜀作風、和地方的創新紋飾，都同時保留下來 (Falkenhausen 1996)。這些兵器不但製作精良，在合金比例上也具實用功能，甚至可發現使用痕跡。不過這些器物或許不是成套傳入，例如作為巴蜀兵器重要組成的鉞，並未發現於牟托。



圖一〇：牟托一號墓出土巴蜀式兵器

(1-2. 改自茂縣等 2012, 46, 圖 43；3-4. 改自茂縣等 2012, 43, 圖 40；
5-7. 改自茂縣等 2012, 37, 圖 29)

另一方面，青銅容器和樂器（含壘、鼎、盞、敦、甬鐘、罍鐘、鐃或鉦）則展現了長江中游或南方的風格；其中亦有長江中游地區仿製來自中原的進口品，此時器物可能同時帶有楚式和中原風格。其傳入可能與春秋中期後楚國的西向擴張有關（朱萍 2010, 283）。亞當史密斯（2001）和朱萍（2010, 276-280）均指出，這些器物的傳入是透過巴蜀所在的峽江地區和成都平原，因此即使銅壘和鐃都不是巴蜀的典型器物，但在成都平原新都馬家鄉戰國木槨墓的銅印中（四川、新都 1981），卻可發現由壘和鐃構成儀式場景的核心（亦見 Falkenhausen 1996），證明這些物品已深入成都人的精神生活。其傳遞可能是漸進式的浪潮，先在蜀文化的核心地區醞釀、轉化，同時也在蜀地留下轉化後的產品。

不同於進口自來源地的精美器物，牟托的發掘者指出一些在周文化核心地帶以外地區製作的「禮樂器」，如岷江上游，常顯得粗糙，表面未加打磨、也未發現使用痕跡，與實用的兵器、石器不同，可能是特別為墓葬製作的明器（宋治民 2004；茂縣等 2012, 92）。這些可能是當地製作的「禮樂器」，儘管在器形上極力模仿長江中游的風格，但細看其裝飾細節、銘文有無，⁴⁹ 則均與周核心地區不同，其中銅甬鐘如 K1:4 在反面僅有簡陋的裝飾，與正面突出的枚數亦不相當，可

⁴⁹ 所有牟托物件中僅有一件銅鼎 (K3:1) 帶有銘文。

能僅以正面示人，或僅供遠處觀看。⁵⁰ 這些物件無論製作或配套、組合都不符合周核心儀式的規範，是否做為「禮樂器」相當可疑（茂縣等 2012, 95；Falkenhausen 1996）。其次，這些「禮樂器」在出土時，內部有時盛裝了其他的玉石、青銅兵器或工具（如 K1:2、K2:6、K2:7）（茂縣等 2012, 93），因此雖然牟托和許多南方遺址一樣對鐘有特別的愛好，亦是四川一地目前所知隨葬鐘的種類最多者，但對鐘的使用或陳列方式、儀式或社會意義，均不同於楚文化，或許和成都平原也是不同的。當這些「禮樂器」傳遞至岷江上游，已失去在傳統流傳地區的使用場景與功能，器物彼此之間的區別分類在進入當地的文化價值體系後，很可能也不再重要（Falkenhausen 1996）。

(2) 由北而來的習尚風物

與北方的交流承襲了更早由北方而來的路線，以生業活動及陶器類型為主，明顯的例子是由新石器時代起便引入當地的粟黍旱作及家豬（趙志軍、陳劍 2011），不僅成為新石器時代營盤山遺址的主要生業，到了石棺葬時期仍以此為主食。⁵¹ 在牟托墓中，也依然可見殘存於青銅容器中的碳化粟；另外還新增了可能也是來自北方的麥（何錕宇 2018）。陶器方面則有帶有乳丁或漩渦暗紋的陶罐，明顯為受到甘青地區文化的影響。在以生業工具為主的石器方面，也仍是當地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遺緒，可能與北方傳入的穀物有伴隨關係，故多見於橫斷山脈。

除了甘青的生活方式，由北而來還有歐亞草原諸多的風格影響。由此引入的器物或風格以飾品和兵器為多，如過去有學者猜測在岷江上游並不罕見的玻璃珠可能來自地中海，⁵² 後經中亞游牧民族帶入（鄭德坤 [1946] 2004），以此暗示可能與西方有所聯繫。⁵³ 而在牟托所有飾件中，最特別的可能是一件銅牌飾（圖一一），以成排、分層的動物為主題，層與層間以幾何紋飾作為間隔，動物則呈現其側面像——或分別由左右朝向中心（最上層），或朝向同一方向。類似的動物主題可能由歐亞草原傳開（周志清 2012），並在東周中期影響了周文化地區（Falkenhausen 1996）。在雲南雖然也出現類似主題的紋樣，但時間上較晚，如鰲鳳

⁵⁰ 江章華 (2011) 認為背面的省略是越式甬鐘的一項特徵。

⁵¹ 見上節關於石棺葬 2003T22②人牙的檢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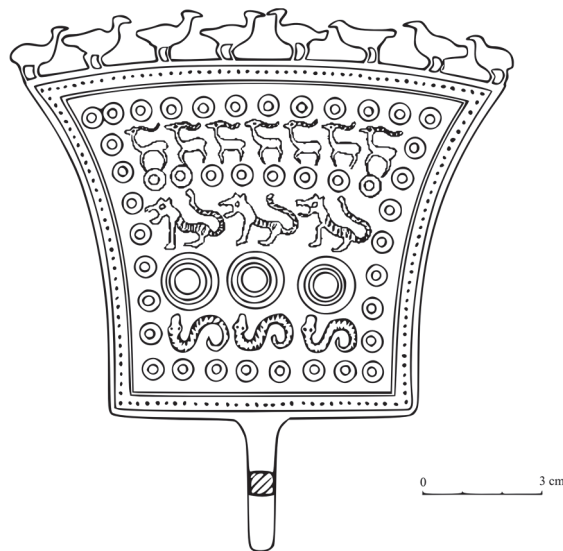
⁵² 如理縣佳山墓地（比較趙德云 2016, 100）。

⁵³ 反對者則根據其鉛鋇玻璃的成分，認為是受楚文化影響之下的地方製品（茂縣等 2012,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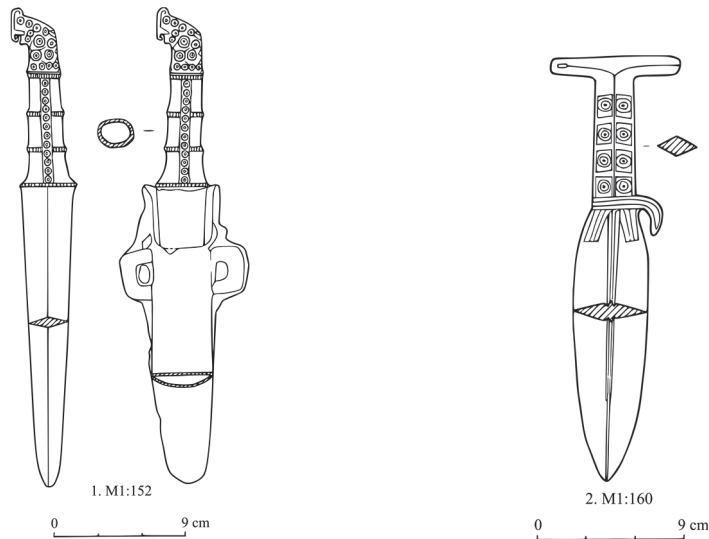
林圭偵

山墓地（約當西元前七至六世紀至西元前一世紀），因此可能是由西北經岷江上游續傳向南。

其他可能是來自草原、經岷江上游南傳入滇的，尚有帶銜孔的兵器（周志清 2016），以及以動物或其簡化風格裝飾兵器的習尚，這類主題在殷墟也多有發現。在牟托，以此為裝飾的青銅劍，有時配有劍鞘，或單劍、或雙劍，劍鞘有時裝飾繁複（圖一二：1）。這類器物也在更南方的鹽源青銅時代墓葬（涼山、成都 2009）及滇西出現。另有一類銅劍具有較寬的枕部（圖一二：2），在營盤山墓地一九七九年的清理中，亦有相當接近的發現（成都等 2013, 304），原型可能來自北方草原，經過岷江上游、次傳遞至滇文化，再度顯現岷江上游為南北向傳遞的要道。



圖一一：牟托一號墓之銅牌飾 (M1:65)
（改自茂縣等 2012, 51, 圖 47）



1. 以簡化動物首為裝飾的青銅劍及劍鞘

(改自茂縣等 2012, 48, 圖 44)

2. 匕首式短劍

(改自茂縣等 2012, 46, 圖 43)

圖一二

(3) 與南方的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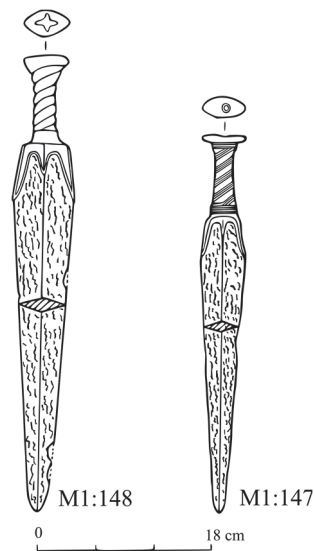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提到部分器物由北方草原或成都平原，經岷江上游續往南傳，透過可通行的河谷，傳播路徑可能更為多元。另外還有些器物無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原型，但同時出現於牟托基地和橫斷山脈南段的墓葬中，包含鹽源盆地青銅時代墓葬和雲南西部的墓地。其中，在牟托所發現的銅柄鐵劍（圖一三）或許還關乎著鐵器何時傳入岷江上游的問題。這類銅鐵複合劍最初可能是由模仿同類型青銅劍而來 (Falkenhausen 1996)，它們雖可在北方固原找到相近的造型，但仍以滇文化墓葬中最为多見，尤其西漢早期出自李家山墓地的銅柄鐵劍（雲南 1975；雲南等 2001, 2007），在形制上與牟托甚為接近（茂縣等 2012, 98）。另一種牟托所見的圓形柄青銅劍，在滇文化的石寨山、李家山也有類似的發現，但在雲南一端的材質為銅柄鐵劍，可見二類材質（青銅與銅鐵合製）的交互影響。

牟托與滇文化的互動緊密也顯現於銅護臂的使用，這類可能屬於武士的器物，在岷江上游過去並未發現，但在鹽源青銅基地和滇文化墓葬中卻受到喜愛（茂縣等 2012, 98）。也由於這些器物與滇文化的類似，使發掘者傾向於將牟托墓

林圭偵

葬的年代定至戰國晚期。然而這些器物幾乎都有更早的北方原型，傳播至岷江上游，不一定如滇文化的時間晚 (Falkenhausen 1996)。若因為岷江上游或北方較不流行這類器物，便認定起源是南方滇文化，反而將錯失探索這些器物因何進入滇文化社會、受到喜愛以至融入其文化的社會背景。

這些同時見於牟托和雲南的器物，雖無法確認其來源，卻顯示了二地的密切關係。武器之外，牟托的海貝可能也顯現了與南方的聯繫，但其來源與路徑此時尚難斷定。隨葬海貝在戰國晚期、西漢初期並不少見，橫斷山脈與印度洋或南方的交流在此時可能是活絡的。除海貝本身，亦有以其他材質如綠松石或琉璃珠，摹仿製作成海貝形狀者 (鄭德坤 [1946] 2004)。令人想起金沙遺址中也曾發現玉質海貝；以及在西南地區常見以青銅容器盛裝海貝的情形。以高貴材質 (玉) 摹仿遠方不易獲得之物品，或與高級器物 (青銅容器) 相伴出現，無疑都彰顯了海貝的價值。



圖一三：一號墓出土銅柄鐵劍

(改自茂縣等 2012, 46, 圖 43)

2. 十字路口上的製作知識與技術

其次，不同區域所製作之青銅器，不但造型風格有別，合金成分也有其傳統配方，以及因此形成的地區特徵；藉此，我們也可進一步區分風格相同的產品，是否來自不同產區；或哪些產品可能是模仿其他地區的風格，而非直接進口。如一號墓中的二個銅盞（M1:67、M1:71），雖在外型上風格接近，但細分其合金成分，一者為高鉛（楚地傳統），一者為高錫（中原傳統）（見楊穎東等 2012，附錄三表一之成分分析結果）；二者在出土時，器中都尚餘有食物，前者（M1:67）盛裝肉類食物；後者盛裝碳化麥類（茂縣等 2012, 29-30），使用脈絡相似。楚地與中原因地理上的相近，交流繁盛。或許是楚地進口了中原器物後，與楚器一起交換至岷江上游。

至於牟托當地製作的青銅器似乎含鉛量較高（>16%），但錫的成分則較楚文化地區為低，甚至有銅劍刃部的鉛高於 35%、錫低於 10%，在硬度上不利於作為兵器，看似非實用器物。⁵⁴ 但另一方面，牟托工匠似乎有意利用冷變形加工技術來提升刀刃的硬度（楊穎東等 2012, 147），應是仍然在意性能，且對加工技術與金屬性能有一定的認識。至於其他可能為當地製作的劍（K1:10、K1:11），及疑為仿製的楚式甬鐘（K1:4）中，鉛的比重也均偏高，其配方與成都平原的器物不同，但這還有待檢驗更多確知為當地製作的青銅器，以及作坊遺跡的確認，始能比較明確。

數量最多的巴蜀式兵器，大致反映出成都平原的合金配方為鉛錫青銅，⁵⁵ 若干兵器更可觀察到金銀「虎斑紋」（如銅劍之一 M1:4）。⁵⁶ 但當中又頗有差異或例外，或許牟托的「巴蜀式兵器」中除了進口自成都平原外，也有當地仿製者（如含高鉛的 K1:12、K1:13）；巴蜀中可能也有多處作坊，導致合金配方並不集中、製作水準不一。其中或許也有受楚文化影響者，以致有錫青銅的「巴蜀式兵器」。

以上對於合金成分的比較，因囿於目前材料僅是初步的，還需考慮各地、各器類的鑄造傳統。儘管如此，仍可看出牟托器物來源的多樣、器表呈現風格與鑄造工藝傳統不一致，以及製作各異的器物被組織成套的情形。例如一號墓中三件

⁵⁴ 反之，就發掘報告附錄（楊穎東等 2012）所見，若是北方草原文化風格的銅劍則有高錫（>15%）、低鉛（<10%）的現象，就合金比例而言較適宜做為兵器。

⁵⁵ 多數鉛偏高，但也小於 20%；錫則小於 17%。

⁵⁶ 這也是巴蜀兵器的重要特色之一（姚智輝 2006），並可在合金成分上加以識別。

林圭偵

一組的鑄鐘，出土時以竹索繫在一起，看似為一組，⁵⁷ 然而經由檢驗合金成分，卻發現三件器物各不相同，整體更接近成都平原的產物，而非南方；也符合先前學者對於這類器物至西周後便已絕跡於南方原產地的觀察（見江章華 2011）。

另有些器物在外觀風格和合金配方上雖有一致性，但仍然不能完全肯定製作地，如上述同時具有北方草原及滇文化風格的動物紋銅牌飾（圖一一），經檢驗合金成分為砷青銅，這是更早便已在新疆及甘青地區發展起來的合金特色，但在其他牟托的周邊文化中，如滇文化亦有少量的發現，因此產品傳入的方向仍然無法完全肯定，甚至也有可能是牟托當地採用了砷青銅加以仿製，這種種可能與不確定，源於當時交流的發達與多向性；製作知識和產品流通不見得同步；新發明或技術也不見得和器形一起被採納，因此「模仿」可能發生於不同的層次，若不細加檢驗或許就無法察覺。

在合金成分之外，崔劍鋒等（2012，附錄二）另藉由分析具有示蹤作用的鉛同位素，指出一號墓的楚式銅盞 (M1:67) 礦料來源為高放射性成因鉛，⁵⁸ 明顯不同於其他器物，可能來自楚文化所在的地區，尤其是湖南。亦即，綜合器形、紋飾、合金成分和鉛同位素都將此件器物的來源指向楚地。除此，他亦指出 K1:6（楚式銅盞）、K1:9（楚式銅盞）、M1:133（南方鑄鐘）三者；以及 K1:4（南方甬鐘）、M1:143（蜀式銅矛）二者，鉛同位素也幾乎一致。崔劍鋒等因而懷疑這些具有相似鉛同位素組成的器物，不論器形為何，應是使用同一批礦料在短時間內於牟托當地製作，而非歷經長時間的器物收集。由鉛同位素分析產生的結果，提供過去不曾發現的層面，值得進一步探究。當多種線索同時具有一致性時，更能讓我們得出可靠的推論。不過由於目前還缺乏可比對的四川礦源，所指同一批礦料位在何處還是有其模糊地帶，且由礦料推測製作地仍有困難，亦不能排除長江中游以外四川某處作坊的可能；加上崔劍鋒等僅檢測了十件器物，它們的狀況不一定能推及其他。但無論如何，牟托的使用者作為「客戶端」，有能力進口或仿製，甚至可能指定某處作坊製作部分所好器物，將這批原型、風格各異的器物，按其自身邏輯分組、使用，最後放置於墓葬、窖藏中，反映當地對不同器物的知識與喜好。

在秦滅巴蜀 (316 BC) 之前，西南地區雖然早已捲入更為龐大的互動體系，但整體仍然維持自有的政治、社會獨立與獨特性。真正的整合還要經過數個世

⁵⁷ 發掘者原認為三者均為當地製作並呈現南方風格（茂縣等 2012, 96）。

⁵⁸ $^{206}\text{Pb}/^{204}\text{Pb}$ 高達 20.957。

紀。與此同時，雖然西元前三一〇年秦武王已在汶山一帶設置湔氐道，將岷江上游也納入中原政治系統，但真正的「開發」與「漢化」卻可能要等到西漢末、東漢初之際。學者認為有效的漢化，與鐵器在西南地區傳播、促成該地區的經濟開發有關（周志清 2014, 3），此時距離鐵器在「中心」運用已歷時久遠，說明新技術的傳播與普及常存有一定的時間差。一地能否接受新傳入的物質或技術，也往往與當地的社會背景有關。當鐵器傳入時，橫斷山脈的青銅文化仍處於高峰；二種材質碰撞的結果是銅柄鐵劍的流行，只是此種結合在西漢前都未落實於生產活動中，以促成更深層的漢化與開發。漢化未逮的結果是，石棺葬俗也一直持續至東漢才逐漸消失，終與四川盆地取得同步（何錕宇 2018）。這種生業型態與精神信仰的改變無疑是一種更深入的同化，從中也可發現當地對外來進口物、流行風尚、製作技術、生業活動、葬俗文化的接受，既具有層次，又互相牽連。只是對漢王朝而言，岷江上游仍如前述《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載為「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之地（86:2857-2858）；成都平原則介於中間，扮演（次）次中心或半邊緣的角色，「西南夷」之間的差異也遭到扁平化與齊整化。此時的王朝仍然無視川西邊緣早已存在來自各方向暗潮湧動的知識、技術與人群交流。

3. 十字路口上的人群

上述這些墓葬或器物坑中經常展現出不同源流的器物共存一處，如雙耳罐、四耳罐、三聯罐、鼓形壺、豆、戈、刻、刀、斧、及半兩錢、五銖錢等，可見該區域與他方的聯繫，及相異於來源地的組合使用方式。辨識外來物品之所以重要，除了指示技術叢集之外，更在於其背後所暗示的人群交流，與其交換貿易網絡。雖然本文的目的並非將考古文化對應於特定族屬，但思考背後可能的人群，以及與之相伴的概念、知識和技術，能使我們避免將物質文化過度抽離其原有的社會意義脈絡。以營盤山石棺葬墓地而言，與之同時還有許許多多分布於各流域的墓地，然而即使葬俗或物質文化上的重疊與相似，若進一步細分，實則山區族群多元分歧的生業與經濟型態有其不同的面貌。這種歧異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便已存在，如其時在強力的北方文化籠罩下，橫斷山脈中南部的遺址雖然也在陶器器形和紋飾母題的表現上受到影響，但表現的技法卻有不同。有學者推測甘青彩陶的傳遞輸入至漢源獅子山遺址（馬繼賢 1991）已無以為繼，更南方的陶匠雖有意摹仿，但缺乏施彩的原料或知識技術，僅能以戳刺的方式進行相仿的裝飾，這或

林圭偵

許即是童恩正所主張之彩陶主題的再現（西藏、四川 1985；見霍巍 2005）。除去這層影響，橫斷山脈中南段的遺址在物質文化方面，彼此更為接近而與北段有異；然而，若再進一步檢視，又能發現鄰近遺址間具有差別，如上所述鹽源峽家堡遺址以及鄰近的橫欄山遺址（成都等 2006, 2016），二者時代與文化性質雖然相近，卻顯示了不同的生業型態組成比例與過渡性質——前者飲食以粟為主；後者則有明確的稻米遺留，似乎暗示二者有不同的接觸來源，受北方影響程度亦不相同；橫斷山區的交流圖像顯然比過去所知更加複雜。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牟托墓葬和器物坑多樣的外來品中，除了那些利用當地可得原料盡力模仿外來器物的例子，也頗有一些只得其形、不在乎其意者，此時工匠選擇了在仿製器形後，改飾以本地盛行的圖騰和母題，這無疑是更加自由的創作、疊加。惟應強調的是，即使地區之間頻繁的交流有時使文化因素的來源難以辨認，然而不論盡力模仿或添加創作，岷江上游的使用者並不與器物原型的來源處共享同一價值體系或符號系統。或許可以想像的是，遠方物品的不易獲得使人更加珍愛，甚至賦予神秘特殊的力量（Braun and Plog 1982, 511; Flad 2012; Helms 1988, 1993, 32-37），以致除了材料的稀有性及工藝成就之外，物品也常因歷經長程貿易而價值倍增；這種空間上的距離，當轉化成時間或歷史上的距離，有時也能成立（Lin 2013, 60）；反之，當物品受到珍愛時，也更有可能有較長的使用歷史（Falkenhausen 1996），這或許是人們收集、儲存遠方以及不同時期的物品、最終埋置一處的原因。當其流通時，它們可能促使貴族間彼此競爭，藉由收集外來物資增加自己的資本，這也是 Marshall Sahlins (1994, 434) 觀察庫克群島時得到的印象。同時，這些珍貴物品也往往進入宗教儀式的範疇之中，藉儀式以達到積集財富和再分配的目的。

牟托石棺葬和器物坑的埋藏，代表的不僅是死者社會身分的顯要，是值得社群投入相當人力與物資的對象，同時，歷史長短不一、文化來源甚廣的器物群也是此社群有意收集或仿造的——此時埋藏作為儀式，除了彰顯死者的社會身分，使其墓葬成為可紀念的地景，也藉由營造墓葬、器物坑和埋置珍貴的物資，達到社區內部一時的權力與財富平衡。人力更因此一事件而短暫聚集。岷江上游在此場景下，不再只是文明十字路口中傳遞物質文化的人，而是最終的使用者和儲存者。

三·討論：流動的饗宴

在以器物、技術發明、葬俗所勾勒出的傳播帶上，岷江上游尤被視為「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中部」（茂縣等 2012, 118），幾乎所有傳播帶上的代表性器物或文化因素，都可在此尋得蹤跡。然而儘管傳播帶上的各處可透過相似的物質文化串連，各地區仍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對於外來文化不同程度的喜愛、排斥、轉化，無疑造成不同的發展。透過川西山區營盤山和牟托這二處時代、地點接近，但社會地位似乎相當懸殊的墓葬，我們發現岷江上游與外地交流的頻繁程度，尤其與成都平原的密切來往，以及本地在接受外來的人或器物時，所顯現出的主體性，使原本難以捕捉且持續變動的社群關係得以顯露跡象。

在營盤山墓地的例子中，透過人祭坑暴力的殺殉儀式，間接透露社區共同體隱約的範圍和人我的界線。如同 Maurice Bloch (1987) 所指出，埋葬的儀式結合了宗教信仰、意識型態、經濟和物質文化、社會組織等，反覆實踐形成族群認同（亦見 Beck 1995, 171）。而衝突的事件則提供我們探測族群接觸的政治、經濟目的，及社會、文化上的後果；更何況族群的界線往往是如此曖昧不明，使身在其中的人平時無所察覺，而需藉由特殊的事件方得以彰顯，且因應不同情況也非一成不變。或許如 Lane Anderson Beck (1995, 171) 視之為連續性的光譜比較能描述此種彈性——族群所屬僅是對一組社會、意識概念的依附程度不同。這樣的模糊性或許也是考古學者長久對新石器時代的岷江上游應被視為馬家窯文化的「地方類型」，或自成一「營盤山文化」的爭議由來。

牟托墓葬和器物坑的例子，則更展示了岷江上游在匯聚了多元文化來源的器物後，發展出自身的使用背景與意義。二起埋藏事件中，山區聚落都呈現了接觸地帶的特質與自主性選擇，並且隱含了重要的社會與區域關係。尤其在原來看不出社會階層的石棺葬墓地中，此二例的社會身分顯得格外特殊，而其特殊之處恰是由區域互動中顯現。以下將由三方面討論之。

（一）知識傳遞與技術選擇

知識與製作技術的傳播至少可分成幾個層次來討論——器形、製作工序、使用知識以及象徵符號。例如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川西山區，在與北方文化接觸的初始，進口了北方的彩陶，形成外來陶器與本地陶器共存的現象，部分本地陶器雖然模仿了外來陶器的質地，但仍維持自有的陶土配方，紋飾上也未能如實複製

林圭偵

(洪玲玉等 2011)；表現出器形、紋飾風格、組成成分接受上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在青銅時代也仍然明顯，山區聚落在接受了十二橋文化的陶器器形時，工匠利用了當地可得的黏土資源，製成外型看似相似，但實則較為粗糙，大小也欠缺一致性的陶器；同時，這些十二橋文化的陶器和北方類型的陶器共同組成常見的隨葬器物群，這種組合也是原生地所未見的。

稍晚的牟托墓葬和器物坑，則更突顯礦料來源、鑄造知識（包含合金配方及鍛打技術）、器物外型與使用方式的種種不一致，容易使人因外在形制而誤判。當地出土的銅容器、樂器與巴蜀兵器，都與其來源地或盛行地有不同的組合或使用方式；例如一些產品，器形雖為仿自進口器物，紋飾卻具有本地特色，同時保留了本地的合金配方；或看似成組的器物，實際上卻可能來自相異的作坊；或如銅鐵不同材質合製而成的劍，雖現時無法判定製作地，但也顯示了二組以上工藝與製作流程的合作。可知混搭模式不僅是在一墓葬中集結了不同來源的器物，更甚者在同組或同伴器物上也展現了這樣的特質。因此物質文化的引入有時雖有伴隨效應，但不能預設為一成不變或成套性傳播，更不能預設其使用方式與社會意義能保持不變；看似相似的葬俗或儀式，背後所指涉的信仰系統也可能不同（如 Beck 1995, 171；Ucko 1969, 263）。這當中，每一傳遞、模仿、使用的過程都展現了技術性選擇和決策邏輯（如 Schiffer and Skibo 1987, 599；Edmonds 1990, 57；Lemonnier 1993, 3），也反映出背後的社會習尚。如同在 Sahlins (1994) 的例子中，我們見到地方對中心的不同想像、隨自身興趣而選擇性接受，並藉由外來事物謀取或創造自身利益。在川西山區的例子中，牟托墓葬及器物坑即顯示了地區性的競爭壓力與收集興趣；人祭坑則更是地方對「中心」的能動與反撲。

此時的製作技術就如同生物「馴化」一般（參考 Larson and Fuller 2014），藉由物的文化適應過程，及人有意或無意對部分製作細節的選取與改造，讓原為野生（外來）的物品融入當地的社會秩序，使之符合當地社會使用所需，並獲得新的文化價值 (Lin accepted)。而馴化本身亦為一種技術。當物種、產品和技術傳入川西山區，選擇性地被接受，最終需能融入當地的價值體系，並以此價值體系理解之，始完成「馴化」。

（二）風格、界線與認同

另一方面，創新發明的想法與概念、製作技術、器物、使用及社會意義間的不一致，也在跨越社群傳遞時，與群體界線互相突顯（如 Stark 1998）。正如

Beck (1995, 179) 所強調：技術比象徵符號更易於超越族群界線；物質文化也比宗教儀式更容易突破界線傳播，並且容易隨著人的移動而移動。因此，當相仿的青銅器傳播至他地，不論其為器物本身或製作技術的傳播，都不能據此認為背後的功能、價值體系、文化象徵符碼、社會意義或信仰體系也隨之傳播。其中最固著的象徵符碼，其使用範圍幾乎是 Beck 賴以界定族群界線的指標。然而，這種界線未必清楚存在，對於族群的難以定義、該用何者定義、或顯現於何處？恰是許多試圖定義考古文化者遭遇的兩難，或許由成組互有交集的概念中，反覆實踐與來回修正尚有可能得到較為核心的文化價值所在。但當此文化價值使用於核心之外時，則如 Beck (1995, 172) 所言，其意義仍是缺乏一致性的；尤其非核心所在的邊緣恰是變動性最高、文化特徵混雜最甚之處 (Feuer 2016, 12)，使身處其中的成員未必能清楚自覺族群的界線。

社會界線可能在較為隱微的情況下，透過技術上的風格傳達，藉由慣習 (habitus) 及反覆不斷地實踐，產生特定的歷史傳統，自然地有別於其他群體。相對於此，Michelle Hegmon (1998, 273) 則強調有意的區分，指出一群體可能視情況策略性地採用新發明或選擇某項技術，刻意強調某種風格等作法，以別於其他群體。此時族群界線的建構與技術叢集互相彰顯。Heather Lechtman (1977；亦見 Hegmon 1998, 266, 273) 便指出技術本身也具有風格，亦是族群藉以突顯其文化價值，並區別於外、形成認同的方式。此時新技術或新發明並不單純為實用性的，而是有意被利用來製造社會文化疆界，以符合行動者自身的興趣與利益，不管此「利益」為政治經濟或美學方面。例如在岷江上游的墓葬和窖藏中，我們所賴以區分為不同來源的，除了器類、器形和紋飾之外，也有因合金配方和鑄造技術所顯現出的器表狀態，例如範線、鏽色、斑紋等，顯現技術風格與製作社群或能互相定義。

(三) 區域關係的層次——空間與階層

新石器時代的岷江上游，在生活的許多層面都明顯受到北方甘青地區彩陶文化的影響，在近年的普查中，川西山區各大小支流的許多遺址均有彩陶發現 (蔣成、陳劍 2001)。彩陶之外，許多遺址也以泥質陶為常見，技術上已能燒製火候頗高、質地細膩的陶器。⁵⁹ 但審視其用色或圖樣均不如甘青地區多樣；器形也限

⁵⁹ 經筆者測試燒成溫度，平均在 900 度上下。

於實用性。當彩陶流傳至此，可能是珍貴而不易取得的 (Hung 2011)。對於馬家窯文化以至齊家文化的核心區而言，川西山區毋寧已是傳播的邊緣末端，甚至是外於邊緣的「化外之外」(“external arena”) (見 Stein 1999, 11)。其間的傳播看似由核心單向至邊緣，但這種極度的不均等很可能是學者長期關注彩陶所產生的印象；對岷江上游而言，此時外來文化的來源與路線儘管可能不止一端，但仍以北方為主，同時，陶器的傳播也伴隨著重要的發明，影響當地的生業和人口。然而不論以自我為「中心」、或以他方為「邊緣」，對於相對關係的認知往往是經過一連串文化建構的結果 (Sahlins 1994)，最後產生對他者或外來事物更容易或不易接受的分野。因此，儘管受到北方彩陶文化強烈的影響，川西山區仍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只進口特定類別的產品，並有自身的使用方式與埋藏背景，形成該地區共有的特性。

這個南北傳播帶上既是中部又是邊緣的角色，在西元前四千紀之際發生變化。在此之前，成都平原一直沒有較具規模的人群定居，文化影響所及似乎是由山區漸進至平原。直至新石器時代的寶墩文化，平原地區才開始有顯著的人口增加，寶墩文化晚期或有跌宕，但至青銅時代早期又達於興盛。此時的成都平原已是政治、經濟和宗教中心所繫，與山區的關係至遲在西元前二千紀之交的十二橋文化時期也已有了明顯的反轉，數種十二橋文化的典型器物反過來傳播到川西山區，川西山區反而成為成都平原的「邊緣」，同時也仍然是北方文化南下的「邊緣」。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除了常見到帶有北方色彩的雙耳罐，也可見到十二橋文化風格的陶器併陳；隨後是巴蜀式兵器的西傳，以及透過成都平原西傳的禮樂器。成都平原做為區域中心也扮演了文化的中轉與樞紐角色，同時與川西山區維持微妙的關係——後者除了供應山中資源，亦是四面八方器物、風格類型的匯聚處，甚至利用了來自成都平原的人作為犧牲。

成都平原在青銅時代對川西山區的影響應是廣泛的，除了及於營盤山和牟托的石棺葬墓地，尚有前節述及的昭店村石棺墓 (葉茂林、羅進勇 1999)、勒石村、撮箕山 (徐學書 1998)、大渡河流域的漢源麻家山遺址 (中國等 2006)、青衣江上的雅安沙溪遺址 (四川等 1990) 等，這些傳播的證據進一步證實成都平原的青銅文化，不但往北、往東擴張，同時也伸入諸江的上游地區——橫斷山脈，更為後者帶來交易圈中其他地區的物品；另一方面，成都平原也透過橫斷山脈得到許多外來風物，如北方草原的金屬器和裝飾風格，或許亦有南方的海洋資源等。無論是成都平原或川西山區，遠方、外來的器物都被賦予了超離常軌的價

值，或許也包含外來的人。我們無法知道外來物品的獲得，是否一部分是透過和平的交換、影響，而有時伴隨著暴力與掠奪；外來的人是否被賦予特別的社會身分、宗教上神秘而危險的力量 (Helms 1988, 151, 177)，如同未馴服的外來物種；最終導致人祭坑的暴力儀式行為？此時的川西山區接受其他文化的「禮器」與「武器」，恰代表了二種極端的文化交流類型——前者為儀式、精神上的；後者代表了衝突與征服。只是二者在傳播的過程中，非但時相伴隨，在功能作用上也常重疊交會。

成都平原對川西山區的影響也應是深刻的，許多方向而來的影響均先透過成都平原的轉化，漸次傳至山區；當成都平原面對秦、楚的南下與西漸，在空間和文化上都遭到擠壓，並逐漸被納入更大的交流體系之際，我們可看到成都平原在多個角色間轉換，在面對更強勢、更遙遠的外來文化時，在一層層區域關係中削弱或顯現其主體。另一方面，川西山區不只是接受成都平原的文化傳播，自己也仍然扮演了傳遞的角色，傳遞了經過其消化的物質文化予成都平原和橫斷山脈南端。例如到達此處的北方風格，並非如實被傳送，而是部分在岷江上游留下；部分到了雲南後受到更大的喜愛、模仿與放大，顯現各地不同的選擇。在此互動網路中，成都平原和岷江上游均既是樞紐、亦是過渡，同時也為儲存多方記憶的終點。

Richard Blanton (1994, 157) 引用 Eric Wolf (1955, 1957, 1986) 觀察拉丁美洲社會時，所提出的觀念——開放和封閉社區 (close and open communities)。其中指出，在封閉性社區中，社區共享大部分生產勞動的剩餘 (surplus)，不鼓勵與外人接觸或學習外來事物 (Wolf 1955)。Blanton 也觀察到中心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有別於邊緣傾向於個人風格，多變且富於流動性，並對外來人群、符號意義的加入更為開放（關於認同的流動性亦見 Giddens 1991）。如在南美洲以往處於邊緣的低地濱海地帶，在與西方接觸後成為貿易港口，又因地緣政治的轉移、海洋貿易的興起等因素，轉變為重要的貿易中心。這無疑說明了中心—邊緣的可變動性。

對比筆者過去曾就十二橋文化的金沙遺址群進行生產組織分析，發現其為聚落中心擁有最多樣的手工業產品，形成的風格也最為明顯、穩定；同時，愈接近祭祀中心的核心地帶，手工業產品的一致性也愈高 (Lin 2019)；反觀山區雖然也接受十二橋文化的物質文化，但其製作時常不甚標準，又同時接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導致多變的風格，或許可借用「開放的社區」理解之。這也提醒我們注意有

林圭偵

些邊緣地帶，因為具有重要的天然資源——玉、石、金屬等，以及如同港口般的交通資源，從而擁有「資產」。作為交流的通道，其物品、技術和想法均是流動的；亦能匯集不同時代、地區的產品。此時山區邊緣並不符合被動的、受壓迫的形象（Wallerstein 1974, 398；亦見 Stein 1999, 19）。相反，山區與平原二者間的關係既是多重的，各種政治、經濟、宗教等關係也並不一致（如 Flad and Chen 2013；Schortman and Urban 1994, 402 在他處所觀察到的案例；亦見 Stein 1999, 18）；如同政治上的掌控並不同於經濟上的掌控。川西山區的例子恰好說明即使是政治上的邊緣，仍因所擁有的資源使其得以在其他面向成為關鍵的樞紐。當以往我們將橫斷山脈不加細分、一律視為邊緣化外之地時，很容易忽略個別聚落的處境，及其對生存策略、外來事物種種不同的選擇（參考 Lightfoot and Martinez 1995；Stein 2002）。這些選擇與當地個別的社會情境有所關聯，也與過去接觸他者的經驗有關。真實的圖像往往比歷史描述或社會科學的模型建構更加複雜，也充滿豐富的細節。

由以上所見川西山區的物質文化，尤其在營盤山祭祀坑和牟托墓地的例子中，我們可發現不同來源的器物，加上在地模仿或新創的產品，共組成當地的器物群。看似邊緣遙遠的山區，因此更自由地展現其流動性與自主選擇。這些大半透過成都平原傳遞而來的器物或製作概念，也顯示了當地與成都平原的密切關係。但這不意謂成都平原是川西山區認識外在世界的唯一管道，相反，山區不但更自由地接受了其他來源的物質文化，自身也促成許多物品、技術與發明的流通，如將北方草原風格傳至他處。但在接受外來物品的同時，在相異的使用方式與場景之下，物品原來具有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都遭到了置換。如 Falkenhausen (1996) 所形容，許多物品在發源或中介的地區已不再使用之後，卻意外在牟托保留下來，有如記憶的儲存所。這些地方——成都平原、川西山區以至橫斷山脈南段，既是物質文化的傳遞者，同時也依自己的社會情境與興趣，選擇性地變造、保留，將已適應於別地的物質文化，「再馴化」成適於融入本地社會之中，它們也是一種形式的「保種」者。

在營盤山墓地中，平原地區的人成為山中祭祀的犧牲一節，也扭轉世界體系以中心為主宰的觀點——山區非單純是手工業原料或食品的提供者或被剝削者。針對其他案例的類似看法，雖早為許多倡議修正世界體系理論者提出（如 Chase-Dunn and Hall 1993, 855；Hall, ed. 2000），但在面臨成都平原發展為區域中心，並在許多層面顯露都會化的跡象時（Lin 2019），我們有必要再次檢視其周邊族群

的處境與社會關係如何因應變化，尤其與之最為緊密的川西山區，是否呈現邊緣的流動性，以及從何呈現其主體性。

(本文於民國一一〇年四月七日收稿；同年十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收集材料和討論的過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助和有益的意見，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光祖先生、黃銘崇先生、王明珂先生、李貞德女士、吳修安先生、李修平先生；中國石油探採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政益先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章華先生、周志清先生、陳劍先生、徐隆先生、閔雪女士、楊穎東先生；四川大學原海兵教授。特此表達謝意。文稿投稿後也承蒙匿名審查人給予指正，並提供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惟文中若有疏漏和錯誤，文責由作者自負。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揚雄，《蜀王本記》，收入張守節，《史記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59。
揚雄，《蜀王本記》，收入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二・近人論著

- 丁見祥
2010 〈馬家窯文化的分期、分布、來源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關係〉，《古代文明》8：36-87。
- 于孟洲、夏微
2015 〈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農業考古研究述論〉，《西華大學學報》34.1：40-47。
- 大渡河（大渡河中游考古隊）
2003 〈四川漢源縣 2001 年度的調查與試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1》，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06-383。
- 中日（中日聯合考古調查隊）
2001 〈都江堰市芒城遺址 1999 年度發掘工作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99-126。
- 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6 《徐家碾寺窪文化墓地：1980 年甘肅莊浪徐家碾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 中國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6 〈四川漢源縣麥坪村、麻家山遺址試掘簡報〉，《四川文物》2006.2：3-19。
- 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等（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重慶市文化局、重慶市博物館編）
1993 《四川兩千年洪災史料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平、顧彬
2007 《甲骨文與殷商人祭》，鄭州：大象出版社。
-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
2002 〈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583-624。
2003 《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
- 王家祐
1961 〈記四川彭縣竹瓦街出土的銅器〉，《文物》1961.11：28-31。
四川（四川省博物館）
1959 〈四川新繁縣水觀音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59.8：404-410。
四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
四川大學（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組）
1965 〈四川理縣汶川縣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65.12：614-618。
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博物館、成都市博物館）
1987 〈成都指揮街周代遺址發掘報告〉，《南方民族考古》1：171-210。
四川、新都（四川省博物館、新都縣文管所）
1981 〈四川新都戰國木槨墓〉，《文物》1981.6：1-16。
四川等（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區文物管理所）
1990 〈雅安沙溪遺址發掘及調查報告〉，《南方民族考古》3：293-340。
四川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壩州文物管理所、汶川縣文化體育局）
2006 〈四川汶川縣姜維城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6.11：3-14。
四川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陽市博物館、什邡市博物館）
2013 〈四川什邡桂圓橋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3.9：4-12。
- 本鄉一美
1999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動物骨骼的初步觀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頁522。

林圭偵

甘肅（甘肅省博物館）

- 1976 〈甘肅景泰張家臺新石器時代的墓葬〉，《考古》1976.3：180-186。

石濤

- 2012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植物遺存研究〉，北京：北京大學考古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

安志敏

- 1955 〈中國古代的石刀〉，《考古學報》10：33-51。

成都（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院〕）

- 2004 〈成都金沙遺址萬博地點考古勘探與發掘收獲〉，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2》，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62-95。

- 2005a 〈成都市高新西區國騰二期商周遺址試掘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3》，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37-144。

- 2005b 〈成都市高新西區“大唐電信二期”商周遺址試掘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3》，頁 145-164。

- 2005c 〈成都市高新西區“格威藥業一期”新石器遺址發掘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3》，頁 165-185。

- 2005d 〈成都市高新西區“萬安藥業包裝廠”商周遺址試掘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3》，頁 186-217。

- 2006 〈成都新錦犀包裝廠地點古遺址發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98-110。

- 2008 〈成都高新西區普天電纜古遺址發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6》，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13-139。

- 2017 〈四川雜谷腦河流域採集玉石器材質分析報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42-152。

成都、大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邑縣文物〔保護〕管理所）

- 2015a 〈2012~2013 年度大邑縣高山古城遺址調查試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3》，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44。

- 2015b 〈大邑縣鹽店古城遺址 2013 年發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13》，頁 45-65。

- 2016 〈大邑縣鹽店古城遺址 2002-2003 年發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4》，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58-88。

- 成都、成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
- 2017 《金沙遺址——陽光地帶二期地點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 2018 《金沙遺址祭祀區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
- 成都、阿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 2016 〈四川馬爾康縣腳木足河流域 2013 年考古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14》，頁 1-13。
- 成都、崇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
- 2016 〈崇州市紫竹古城調查、試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14》，頁 40-57。
- 成都、都江堰（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都江堰市文物局）
- 1999 〈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9.7：14-27。
- 成都、新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縣文物管理所）
- 2011 〈新津寶墩遺址調查與試掘簡報（2009-2010 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9》，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67。
- 2012a 〈新津縣寶墩遺址鼓墩子 2010 年發掘報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2》，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63。
- 2012b 〈2010 年新津縣寶墩遺址外城羅林盤地點發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12》，頁 64-77。
- 2016 〈新津縣寶墩遺址 2012~2013 年度考古發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14》，頁 14-39。
- 成都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早稻田大學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 2000 《寶墩遺址——新津寶墩遺址發掘和研究》，東京：Apu (ARP)。
- 成都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茂縣博物館）
- 2002 〈四川營盤山遺址試掘報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0》，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77。
- 成都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縣文物管理所）
- 2007c 〈四川理縣箭山寨遺址 2000 年的調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5》，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5-24。
- 成都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縣羌族博物館）
- 2007a 〈四川茂縣安鄉遺址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5》，頁 1-7。

林圭偵

- 2007b 〈四川茂縣白水寨及下關子遺址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5》，頁 8-14。
- 2008a 〈四川茂縣白水寨和沙烏都遺址 2006 年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6》，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5-30。
- 2008b 〈四川茂縣下關子遺址試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06》，頁 31-62。
- 2013 《茂縣營盤山石棺葬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 2017a 〈茂縣安鄉遺址 2006 年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3-17。
- 2018 《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上）、（中）、（下）》，北京：文物出版社。

成都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 2006 〈四川西昌市大興橫欄山遺址調查試掘簡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4》，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0-38。
- 2016 〈西昌市橫欄山遺址 2014 年度試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4》，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89-114。

成都等（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鹽源縣文物管理所）

- 2017b 〈鹽源縣飯家堡遺址 2015 年度調查試掘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發現 2015》，頁 18-52。

朱萍

- 2010 《楚文化的西漸：楚國經營西部的考古學觀察》，成都：巴蜀書社。

江章華

- 2004 〈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遺存新發現的幾點思考〉，《四川文物》2004.3：10-14。
- 2011 〈關於岷江上游石關墓的兩個問題〉，《南方民族考古》7：201-210。
- 2015 〈成都平原先秦聚落變遷分析〉，《考古》2015.4：67-78。

江章華、顏勁松

- 2003 〈川東長江沿岸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變遷的初步分析〉，湖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湖北省三峽工程移民局編，《2003 三峽文物保護與考古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11-218。

西昌等（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

- 2004 〈四川西昌市經久大洋堆遺址的發掘〉，《考古》2004.10：23-35。

西藏、四川（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系）

1985 《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

何錕宇

2011 〈甘肅東鄉林家遺址分期的再認識——兼論營盤山遺址的分期、年代與文化屬性〉，《四川文物》2011.4：29-39, 42。

2015a 〈馬爾康哈休遺址史前文化與生業——兼論岷江上游地區馬家窯類型的生業方式〉，《考古》2015.5：72-82。

2015b 〈寶墩遺址：成都平原史前大型聚落考古新進展〉，《中華文化遺產》2015.6：26-31。

2018 〈從出土動物遺存看岷江上游戰國秦漢時期生業方式的變化〉，《藏學學刊》2：22-32, 247。

何錕宇、鄭漫麗

2014 〈試論姜維城遺址史前文化遺存的分期、年代及文化屬性〉，《南方民族考古》2014.10：61-74。

何錕宇等（何錕宇、蔣成、陳劍）

2009 〈淺論動物考古學中兩種肉量估算方法——以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為例〉，《考古與文物》2009.5：95-99。

2016 〈試論寶墩文化的源頭〉，《南方民族考古》12：11-26。

何錕宇等（何錕宇、劉祥宇、陳劍、周志清）

2020 〈四川大邑縣高山古城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動物骨骼遺存〉，《四川文物》2020.1：87-106。

宋治民

2004 〈四川茂縣牟托 1 號石棺墓若干問題的初步分析〉，《宋治民考古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23-240。

李水城

2011 〈石棺葬的起源與擴散——以中國為例〉，《四川文物》2011.6：64-69。

李政益等（李政益、林圭偵、陳劍、Andrea Czermak、原海兵）

2018 〈茂縣營盤山遺址兩個人類個體之食譜結構：牙本質膠原序列樣本及骨膠原之碳、氮同位素分析〉，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縣羌族博物館編，《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525-539。

李紹明

1995 〈西南絲綢之路與民族走廊〉，江玉祥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89-102。

林圭偵

汶川等（汶川縣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 2017 〈汶川縣龍溪寨遺址 2009 年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15》，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12。

亞當史密斯 (Smith, Adam)

- 2001 〈川西、滇西北、藏東地區石棺葬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考古與博物館學碩士論文。

周志清

- 2012 〈淺議川、滇西部青銅文化中“北方草原文化”遺物及其文化因素〉，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昌市文物管理所、會理縣文物管理所、鹽源縣文物管理所、德昌縣文物管理所、冕寧縣文物管理所編，《安寧河流域古文化調查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94-402。

- 2014 《滇東黔西青銅時代的居民》，北京：科學出版社。

- 2016 〈淺析川西南青銅時代的管鑿兵器——兼論川西高原在歐亞草原和北方文化傳播帶中的地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46-164。

周志清等（周志清、陳劍、劉翔宇、白鐵勇）

- 2015 〈區域系統調查方法在成都平原大遺址聚落考古中的實踐與收穫——以高山古城遺址為例〉，《中華文化遺產》2015.6：32-37。

周志清等（周志清、孫策、田建波、劉祥宇）

- 2019 〈四川鹽源駁家堡遺址〉，國家文物局編，《2018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36-38。

阿壩等（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馬爾康縣文化體育局）

- 2008 〈四川馬爾康縣哈休遺址 2003、2005 年調查簡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 2006》，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14。

阿壩等（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馬爾康縣文化體育局）

- 2010 〈四川馬爾康縣哈休遺址 2006 年的試掘〉，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6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95-374。

青海、海南（青海省文物管理處、海南州民族博物館）

- 1998 〈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5：1-14, 35。

- 俞偉超
2004 〈四川地區考古文化問題思考〉，《四川文物》2004.2：3-5。
- 姚智輝
2006 《晚期巴蜀青銅技術研究及兵器斑紋工藝探討》，北京：科學出版社。
- 姜先杰
2007 〈西昌經久大洋堆遺址比較研究〉，《四川文物》2007.5：26-35。
- 姜銘、閔雪
2017 〈成都平原史前時期植物考古的實踐與思考——以寶墩古城遺址和
高山古城遺址為例〉，《中國文化遺產》2017.6：69-74。
- 姜銘等（姜銘、黃偉、趙志軍）
2011 〈四川成都城鄉一體化工程金牛區 5 號 C 地點考古出土植物遺存分
析報告〉，《南方文物》2011.3：68-72。
- 洪玲玉等（洪玲玉、崔劍鋒、王輝、陳劍）
2011 〈川西馬家窯類型彩陶產源分析與探討〉，《南方民族考古》
2011.7：1-58。
- 胡厚宣
1974a 〈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7：74-84。
1974b 〈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8：56-67,
72。
- 茂縣等（茂縣羌族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
所）
2012 《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 凌曼立
1963 〈四川理番縣佳山寨史前拾遺〉，《考古人類學刊》21-22：80-
121。
- 原海兵等（原海兵、陳劍、何錕宇）
2018 〈茂縣營盤山遺址祭祀坑出土人骨研究〉，《華夏文明》2018.6：
39-41, 58。
- 唐際根、牛海茹
2013 〈墟王陵區人祭坑與卜辭所見“羌祭”及“殺牲法”研究〉，《人文中
國學報》19：411-431。
- 唐際根、湯毓賢
2014 〈再論殷墟人祭坑與甲骨文中羌祭卜辭的相關性〉，《中原文物》
2014.3：24-28。

林圭偵

孫華

- 1992 〈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5：10-24。
1999 〈峽江地區的先秦文化〉，《國學研究》6：491-523。
2000 〈四川盆地青銅文化初論〉，氏著，《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46。
2002 〈彭縣竹瓦街銅器再分析：埋藏性質、年代、原因及其文化背景〉，高崇文、安田喜憲編，《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126-168。

徐學書

- 1995 〈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5：415-426。
1998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綜述〉，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創建三十五週年紀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222-245。

馬繼賢

- 1991 〈漢源縣獅子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 (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70-271。

崔劍鋒等（崔劍鋒、吳小紅、楊穎亮）

- 2011 〈四川茂縣新石器遺址陶器的成分分析及來源初探〉，《文物》2011.2：79-85。

崔劍鋒等（崔劍鋒、楊穎東、周志清、羅武干、蔡清）

- 2012 〈牟托一號墓出土青銅器鉛同位素比值分析〉，茂縣羌族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31-135。

常玉芝

- 2010 《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強祿

- 1996 〈試論白龍江流新石器文化與川北、川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關係〉，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成立三十五週年紀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頁 70-75。
2002 〈馬家窯文化與仰韶文化的關係〉，《考古》2002.1：47-60。

涼山、成都（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09 《老龍頭墓地與鹽源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國立中央博物院編

- 1942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概況》，〔出版地不詳〕：國立中央博物院。

- 陳星燦
2010 〈中國古代的收割工具——石刀、陶刀和蚌刀的用法初探〉，氏著，《考古隨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77-186。
- 陳葦
2012 《先秦時期的青藏高原東麓》，北京：科學出版社。
- 陳夢家
1988 《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
- 陳劍
2006 〈川西彩陶的發現與初步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 5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7-30。
2007a 〈波西、營盤山與沙烏都——淺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變的階段性〉，《考古與文物》2007.5：65-70。
2007b 〈四川盆地西北緣龍山時代考古新發現述析〉，《中華文化論壇》2007.2：5-15。
- 陳劍等（陳劍、陳學志、范永剛）
2004 〈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調查及營盤山考古試掘綜述〉，《阿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1.4：25-28。
- 陳劍等（陳劍、陳學志、范永剛、蔡清）
2005 〈營盤山遺址：藏彝走廊史前區域文化中心〉，《阿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2.1：1-3。
- 陳衛東、王天佑
2004 〈淺議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四川文物》2004.3：15-21。
- 陳學志
1994 〈馬爾康孔龍村發現石棺墓葬群〉，《四川文物》1994.1：70-71。
- 陳顯丹
1989 〈廣漢三星堆遺址發掘概況、初步分期——兼論“早蜀文化”的特徵及其發展〉，四川大學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學會編，《南方民族考古》第 2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213-232。
- 短綆
1959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考古調查〉，《考古》1959.9：480-481。
- 童恩正
1987 〈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7-43。

林圭偵

費孝通

1980 〈關於我國民族識別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0.1：147-162。

1982 〈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3：2-6。

雲南（雲南省博物館）

1975 〈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2：97-140。

雲南等（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縣文化局）

2001 〈雲南江川縣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考古》2001.12：25-40。

2007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雲南等（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雲南工作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館、永仁縣文化館）

2003 〈雲南永仁菜園子、磨盤地遺址 2001 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2：263-296。

馮漢驥、童恩正

1973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學報》1973.2：41-60。

黃昊德、趙賓福

2004 〈寶墩文化的發現及其來源考察〉，《中華文化論壇》2004.2：14-18。

黃家祥

2004 〈汶川姜維城發掘的初步收獲〉，《四川文物》2004.3：6-9。

黃展岳

1990 《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北京：文物出版社。

楊農等（楊農、張岳橋、孟輝、張會平）

2003 〈川西高原岷江上游河流階地初步研究〉，《地質力學學報》9.4：363-370。

楊穎東等（楊穎東、羅武干、王寧、蔡清、周志清）

2012 〈牟托一號墓出土青銅器的成分分析與金相考察研究〉，茂縣羌族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編，《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36-149。

楊寶成

2002 《殷墟文化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萬嬌、雷雨

2013 〈桂圓橋遺址與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發展脈絡〉，《文物》2013.9：59-63。

葉茂林、李明斌

- 2002 〈崇州市紫竹古城〉，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鑑 2001》，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81。

葉茂林、羅進勇

- 1999 〈四川汶川縣昭店村發現的石棺葬〉，《考古》1999.7：84-85。

董廣輝

- 2013 〈甘青地區新石器文化演化及其環境動力研究進展與展望〉，《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33.4：67-75。

趙志軍

- 2002 〈季節性的增強與栽培稻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1 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69-575。

趙志軍、陳劍

- 2011 〈四川茂縣營盤山遺浮選結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1.3：60-67。

趙德云

- 2016 《西周至漢晉時期中國外來珠飾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劉化石

- 2018a 〈四川會理縣猴子洞遺址〉，《大眾考古》2018.10：12-15。

- 2018b 〈四川會理大劈山墓地〉，《大眾考古》2018.11：12-13。

劉志岩

- 2012 〈麥坪遺址的初步分析〉，重慶市文物考古所、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早期中國的文化交流與互動：以長江三峽庫區為中心學術研討會》，北京：科學出版社，頁 326-335。

劉祥宇等（劉祥宇、周志清、陳劍）

- 2017 〈成都市大邑縣高山古城 2014 年發掘簡報〉，《考古》2017.4：3-13。

蔣成、陳劍

- 2001 〈岷江上游考古新發現述析〉，《中華文化論壇》2001.3：27-31。

鄭德坤

- [1946] 2004 《四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書社。

霍巍

- 2005 〈論橫斷山脈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石碩編，《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頁 272-299。

- 2009 〈成都平原史前農業考古新發現及其啟示〉，《中華文化論壇》2009.11：155-158。

林圭偵

魏京武

- 1993 〈陝南巴蜀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兼論蜀與商周的關係〉，李紹明、林向、趙殿增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頁 218-226。

羅二虎

- 2000 〈中國西南地區古代的繫繩石刀〉，《四川文物》2000.2：19-30。
2012 《文化與生態、社會、族群：川滇青藏高原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羅二虎、李飛

- 2012 〈論古代系繩石刀的功能——兼談民族考古學方法〉，《考古學研究》10：27-35。

羅泰著，林圭偵譯

- 2011 〈漢江上游盆地的青銅時代的若干觀察〉，曹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IV》，成都：巴蜀書社，頁 517-569。

Barth, Fredrik

-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arton et al. (Barton, Loukas, Seth D. Newsome, Fa-Hu Chen, Hui Wang, Thomas P. Guilderson, and Robert L. Bettinger)

- 2009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isotopic identity of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14: 5523-5528.

Beck, Lane Anderson

- 1995 “Regional Cults and Ethnic Boundaries in ‘Southern Hopewell’.” I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Mortuary Analysis*, edited by Lane Anderson Beck.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 167-189.

Bentley, G. Carter

- 1987 “Ethnicity and Practi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 24-55.

Bentley et al. (Bentley, R. Alexander, T. Douglas Price, and Elisabeth Stephan)

- 2004 “Determining the ‘local’ 87Sr/86Sr range for archaeological skeletons: a case study from Neolithic Europ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1.4: 365-375.

Binford, Lewis R.

- 1972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Blanton, Richard E.
1994 *Houses and households: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Blanton, Richard E., and Lane Fargher
2016 *How humans cooperat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collective action*.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 Bloch, Maurice
1987 “The ritual of the royal bath in Madagascar.” In *Rituals of royalty: power and ceremonial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edited by David Cannadine and S. R. F. Pric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1-297.
- Bloch, Maurice, and Jonathan P. Parry
1982 *Death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un, David P., and Stephen Plog
1982 “Evolution of ‘Tribal’ Social Networks: Theory and Prehistoric North American Evidence.” *American Antiquity* 47.3: 504-525.
- Brönnimann et al. (Brönnimann, David, Corina Knipper, Sandra L. Pichler, Brigitte Röder, Hannele Rissanen, Barbara Stopp, Martin Rosner, Malou Blank, Ole Warnberg, Kurt W. Alt, Guido Lassau, and Philippe Rentzel)
2018 “The lay of land: Strontium isotope variability in the dietary catchment of the Late Iron Age proto-urban settlement of Basel-Gasfabrik, Switzerland.”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7: 279-292.
- Brown, James A.
1995 “On Mortuary Analysi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axe-Binford Research Program.” I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Mortuary Analysis*, edited by Lane Anderson Beck.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 3-26.
- Campbell, Roderick
2014 “Introduction: toward a deep history of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of social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prehistory*, edited by Roderick Campbell. Oxford; Oakville, CT: Oxbow Books, pp. 1-22.
- Chang, Kwang-chih
1983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林圭偵

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

- 1991 "Conceptualizing Core/Periphery Hierarchies for Comparative Study." In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edited by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Hall.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5-44.
- 1993 "Comparing world-systems: concepts and working hypotheses." *Social Forces* 71.4: 851-886.

Cheng, Te-k'un (鄭德坤)

- 1946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2: 63-80.

Cohen, Abner

- 1974 "Introduction: the lesson of ethnicity." In *Urban Ethnicity*, edited by Abner Cohe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pp. ix-xxiv.

d'Alpoim Guedes, Jade

- 2011 "Millets, Rice, Social Complexity, and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the Chengdu Plain and Southwest China." *Rice* 4.3: 104-113.

d'Alpoim Guedes, Jade, and Mark Aldenderfer

- 2020 "The Archaeology of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New Research on the Initial Peopling through the Early Bronze Ag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8: 339-392.

Edmonds, Mark R.

- 1990 "Description, understanding and the *chaîne opératoire*." *Archaeological Review from Cambridge* 9.1: 55-70.

Edmonds, Richard L.

- 1985 "Northern frontiers of 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ontier polic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羅泰)

- 1996 "The Moutuo Bronze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late Bronze Age in Sichuan." *Arts Asiatiques* 1996.51: 29-59.
- 2001 "The Chengdu Plain in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Zhuwajie." In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edited by Robert W. Bagley. Seattle: Seattle Art Museum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77-201.
- 2003 "The External Connections of Sanxingdui."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5.1-4: 191-245.

- 2008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Pre-imperial China.” In *The ancient city: new perspectives on urbanism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 edited by Joyce Marcus and Jeremy A. Sabloff.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pp. 209-228.
- Fernández-Crespo et al. (Fernández-Crespo, Teresa, Andrea Czermak, Julia Lee-Thorp, and Rick Schulting)
- 2018 “Infant and childhood diet at the passage tomb of Alto de la Huesera (north-central Iberia) from bone collagen and sequential dentine isotope compos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8.5: 542-551.
- Feuer, Bryan Avery
- 2016 *Boundaries, borders and frontiers in archaeology: a study of spatial relationship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 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 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1995.20: 17-67.
- 2003 “The Qijia culture: Paths East and West.”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5: 55-78.
- Flad, Rowan
- 2012 “Bronze, Jade, Gold, and Ivory: Valuable Objects in Ancient Sichua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 in the ancient world*, edited by John K. Papadopoulos and Gary Urton.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pp. 306-335.
- Flad, Rowan K., and Pochan Chen
- 2013 *Ancient Central China: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along the Yangzi Riv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lad, Rowan K., and Zachary X. Hruby
- 2007 “‘Specialized’ production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s: rethinking specialization, the social value of products, and the practice production.” In *Rethinking craft specialization in complex societies: archeological analyses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Zachary X. Hruby and Rowan K. Flad. VA: Americ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pp. 1-19.
- Fuller et al. (Fuller, Dorian, Emma Harvey, and Ling Qin)
- 2007 “Presumed domestication? Evidence for wild rice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fifth millennium BC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Antiquity* 81.312: 316-331.

林圭偵

Giddens, Anthony

-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Thomas D., ed.

- 2000 *A world-systems reader: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urbanism, cultur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colog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Hatch, Mallorie A.

- 2012 “Meaning and the Bioarchaeology of Captivity, Sacrifice, and Cannibalism: A Case Study from the Mississippian Period at Larson, Illinois.” In *The bioarchaeology of violence*, edited by Debra L. Martin, Ryan P. Harrod, and Ventura R. Pérez.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pp. 201-225.

Hayden, Brian

- 2018 *The power of ritual in prehistory: secret societies and origins of social complex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gmon, Michelle

- 1998 “Technology, style, and social practices: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boundaries*, edited by Miriam T. Stark.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pp. 264-279.

Helms, Mary W.

- 1988 *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Craft and the kingly ideal: art, trade, and power*.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Herrenschmidt, Olivier

- 1982 “Sacrifice: Symbolic or Effective?” In *Between belief and transgression: structuralist essays in religion, history, and myth*, edited by Michel Izard and Pierre Smi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2-42.

Hubert, Henri, and Marcel Mauss

- [1899] 1964 *Sacrifice: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ng, Ling-yu (洪玲玉)

- 2011 “Pottery Production, Mortuary Practice,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Majiayao Culture, NW China (ca. 5300-4000 BP).” PhD di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Jackes, Mary K.

- 2004 “Osteological evidence for Mesolithic and Neolithic violence: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In *Evidence and meaning of Mesolithic violence*, edited by M. Roksandic. Oxford: Archaeopres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pp. 23-39.

Jacobson-Tepfer, Esther, and James E. Meacham

- 2017 “The Sacred Mountain Shiveet Khairkhan (Bayan Ölgii aimag, Mongolia) and the Centering of Cultural Indicators in the Age of Nomadic Pastoral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07.2: 499-510.

Jones, Sian

- 1997 *The archaeology of ethnicity: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Larson, Greger, and Dorian Q. Fuller

- 2014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Domestication.” *The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 2014.45: 115-136.

Lechtman, Heather

- 1977 “Style in Technology: Some Early Thoughts.” In *Material Culture: Styles, Organization, And Dynamics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Heather Lechtman and Robert S. Merrill. St. Paul: West Pub. Co, pp. 3-20.

Lee et al. (Lee, Cheng-Yi, Kuei-chen Lin, Jian Chen and Andrea Czermak)

- 2020a “Dietary history of two human individuals at the Yingpanshan site, Sichuan Province, revealed by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analysis of serial samples of dentinal collag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30.4: 565-574.

Lee et al. (Lee, Cheng-Yi, Kuei-chen Lin, Zhiqing Zhou, Jian Chen, Xiangyu Liu, Haibing Yuan and Pei-Ling Wang)

- 2020b “Reconstructing subsistence at the Yingpanshan and Gaoshan sites in Sichuan Province: insights from isotope analysis on bone samples and charred crop remains.” *Archaeometry* 62.1: 172-186.

Lemonnier, Pierre

- 1993 “Introduction.” In *Technological choices: 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s since the Neolithic*, edited by Pierre Lemonni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5.

林圭偵

Lightfoot, Kent G., and Antoinette Martinez

- 1995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471-492.

Lin, Kuei-chen (林圭偵)

- 2013 "Pottery Production and Social Complexity of the Bronze Age Cultures on the Chengdu Plain, Sichuan,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2019 "On craft production and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the Jinsha site cluster on the Chengdu Plain." *Asian Perspectives* 58.2: 366-400.

- accepted "The Archaeology of Community: Changing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ncient Sichuan, China, from the Yingpanshan to Shi'erqiao periods." In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Ritual and Econom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Anke Hein, Rowan Flad, and Bryan Miller.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Lin et al. (Lin, Kuei-chen, Cheng-Yi Lee, and Pei-Ling Wang)

- 2022 "A multi-isotope analysis on human and pig tooth enamel from prehistoric Sichuan, China and its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4.8: 145 (published online first).

Linduff, Katheryn M., and Jianhua Yang

- 2012 "Ritualization of weapons in a contact zon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archaeology of power and politics in Eurasia: Regimes and Revolutions*, edited by Charles W. Hartley, Bike Yazicioğlu, and Adam T. Smi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3-187.

Liu, Li, and Xingcan Chen

-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k, Burton

- 1987 "Introductio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Violent origins: ritual killing and cultural formation*, edited by Robert G. Hamerton-Kell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0.

Milner, George R.

- 1995 "An ost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rehistoric warfare." In *Regional Approaches to Mortuary Analysis*, edited by Lane Anderson Beck. New York: Plenum Press, pp. 221-244.

- Morris, Ian
1992 *Death Ritua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Jon
1984 “Mississippian Specialization and Salt.” *American Antiquity* 49.3: 489-507.
1987 “Salt, Chert and Shell: Mississippian Exchange and Economy.” In *Specialization, Exchange, and Social Complexity*, edited by Elizabeth M. Brumfiel and Timothy K. Earle.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21.
- O’Shea, John M.
1984 *Mortuary Variability: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Pearson, Mike Parker
1999 *The archaeology of death and burial*.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Sahlins, Marshall
1994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In *Culture/power/histor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Nicholas B. Dirks, Geoff Eley, and Sherry B. Ortn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412-455.
- Saxe, Arthur A.
1970 “Social Dimensions of Mortuary Practic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 Schiffer, Michael Brian, and James M. Skibo
1987 “Theory and Experiment in the Stud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Current Anthropology* 28.5: 595-622.
- Schortman, Edward, and Patricia Urban
1994 “Living on the edge: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ancient southeastern Mesoamerica.” *Current anthropology* 35: 401-430.
- Schulting et al. (Schulting, Rick J., Petrus le Roux, Yee Min Gan, John Pouncett, Julie Hamilton, Christophe Snoeck, Peter Ditchfield, Rowena Henderson, Priscilla Lange, Julia Lee-Thorp, Chris Gosden, and Gary Lock)
2019 “The ups & downs of Iron Age animal management on the Oxfordshire Ridgeway, south-central England: A multi-isotope approach.”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01: 199-212.

林圭偵

Shennan, Stephen

1989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Boston: Unwin Hyman.

Slovak et al. (Slovak, Nicole M., Adina Paytan, John W. Rick and Chia-Te Chien)

2018 “Establishing radiogenic strontium isotope signatures for Chavín de Huántar, Peru.”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9: 411-419.

Smith, Bruce D.

1986 “The archaeology of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From Dalton to de Soto, 10,500-500 B.P.” In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5*, edited by F. Wendorf and A. E. Close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pp. 1-92.

1989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Science* 246: 1566-1571.

Snoeck et al. (Snoeck, Christophe, John Pouncett, Greer Ramsey, Ian G. Meighan, Nadine Mattielli, Steven Goderis, Julia A. Lee-Thorp, and Rick J. Schulting)

2016 “Mobility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in Northern Ireland explored using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of cremated human bon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0.3: 397-413.

Stark, Miriam T.

1998 “Technical choices and social boundaries in material culture patterning: an introduction.” In *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boundaries*, edited by Miriam T. Stark.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pp. 1-11.

Stein, Gil J.

1999 *Rethinking world-systems: Diasporas, colonies, and interaction in Uruk Mesopotamia*.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From passive periphery to active agents: emer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3: 903-916.

Stone, Tammy

2015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middle-range societies: a view from the Southwest*.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Ucko, Peter J.

1969 “Ethnography and the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unerary Remains.” *World Archaeology* 1: 262-277.

Wallerstein, Immanuel

-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a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olf, Eric R.

- 1955 “Types of Latin American Peasantry: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3 (Part 1): 452-471.
- 1957 “Closed Corporate Peasant Communities in Mesoamerica and Central Jav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3.1: 1-18.
- 1986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Closed Corporate Peasant Commun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3.2: 325-329.

Wong et al. (Wong, Megan, J. Rasmus Brandt, Sven Ahrens, Klervia Jaouen, Gro Bjørnstad, Elise Naumann, Camilla Cecilie Wenn, Henrike Kiesewetter, Caroline Laforest, Erika Hagelberg, Vienna C. Lam, and Michael Richards)

- 2018 “Pursuing pilgrims: Isotopic investigations of Roman and Byzantine mobility at Hierapolis, Turk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17: 520-528.

Zhang et al. (Zhang, X. L., B. B. Ha, S. J. Wang, Z. J. Chen, J. Y. Ge, H. Long, W. He, W. Da, X. M. Nian, M. J. Yi, X. Y. Zhou, P. Q. Zhang, Y. S. Jin, O. Bar-Yosef, J. W. Olsen, and X. Gao)

- 2018 “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 40 thousand to 30 thousand years ago.” *Science* 362.6418: 1049-1051.

林圭偵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Xueshan Mountain Range: The “Ancestral Land” of the Chengdu Plain during the Bronze Age

Kuei-chen Li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t the turn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settlements of the Shi'erqiao culture formed a large Shi'erqiao-Jinsha cluster around what is now the modern city of Chengdu and developed into a new settlement center. Small-scaled villages also appeared in many places of the Chengdu Plain. Not only had the number of settlements increas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settlements expanded, but the populations constituting these settlements became more diverse during this time. Frequent ritual activities formed a mechanism that gathered together multiple social groups; ritual items which came from afar testify to the external connections of the settlements of the Chengdu Plain.

Meanwhile, long before the Chengdu Plain became inhabitable, a number of settlements had been established along the Upper Minjiang River beginning around 3300 BC. Because of their crucial locations along traffic routes in the western highlands of Sichuan, these settlements remained important in regional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periods and maintained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engdu Plain. They acquired foreign goods directly from or via the plain. In this research, I examine two cases from the Upper Minjiang River, namely, the sacrificial burials discovered at the Yingpanshan site in 2003 and the stone coffin burial, along with artifact pits, found at Motuo in 1992. There is a contrast in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dead at these two sites. I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complexity of this “marginal region” and discuss the reg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the highlands and the lowlands, a division which has otherwise been difficult to grasp.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lands and the lowlands, which took shape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is far more entangled and dynamic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nd is beyond the spread of artifacts. The communication taking place between the two involved not only multi-layered material exchanges, but also other aspects of social life, including the spiritual and subsistent dimensions, all of which affected their respective regional developments. Such communication cannot be simplified as (secondary) core-periphery relationships. The western Sichuan highlands

were also not isolated from foreign cultures, but rather selectively accepted features from them. Therefore, Xueshan Mountain, despite being described by the poet Tu Fu as a cloudy fairyland or thought of as the cultural origin of the Chengdu Plain, was inhabited by real people whose agency in cultural exchang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They were not necessarily passive receivers subordinate to the plain but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networks of exchange, which also influenced the peoples of the Chengdu Plain.

Keywords: Chengdu Plain; Upper Minjiang River; Shi'erqiao; Moutuo; Yingpanshan